



中美聚焦

文摘

2021年11月号 总第17期

避免冲突 砥砺前行



ISSN 2414-0783



9 772414 078005

出版 中美交流基金会

主 席 董建华

发 行人 黄德荫

主 编 张 平 常 虹

顾 问 朱英璜

编 辑 彭 慧

《中美聚焦文摘》是一份双月刊杂志，刊登中美两国具影响力的领袖和学者有关两国相关议题的评论文章。

您的意见和建议，请电邮至
digest@cusef.org.hk

公司地址 香港上环干诺道西 3 号亿利商业大厦 20 楼
电 话 (852) 2523 2083
传 真 (852) 2523 6116



cn.chinausfocus.com

关注 Facebook 和 Twitter: @ChinaUSFocus

特别鸣谢

Chatham Strategies 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鼎力支持

目录



中美元首共同反对“新冷战”

P. 06

赵明昊

两国元首在视频会晤中表达了反对新冷战的立场。老朋友寻求恢复关系，向前迈进，既接受竞争，又避免冲突。如何做到这一点是大问题。



中美峰会：寻求某种稳定

P. 09

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通过双方首次直接面对面地举行“峰会”，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试图在紧张、恶化的中美关系中搭建一个平台，并设置某种“护栏”来管理竞争关系。双方都表示这是向前迈出的积极一步。

元首会晤引领新时期中美相处之道

P. 11

易凡

作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走向受到广泛关注。国际社会对此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高度期待，其成功举行中美关系未来指明方向。

久候终至的首脑会晤

P. 15

柴泉

在过去了 10 个月之后，习近平和乔·拜登终于安排了会面，这反映出中美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习近平和拜登一度经常见面，而最近的这次视频峰会也许有助于两国关系解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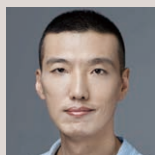


中美缓和：不能高估，也不应低估

P. 18

达巍

双方似乎都意识到，两国关系模式的转变不可避免，而且已在进行当中。如果失控，如果滑向对抗，任何一方都不会受益。习近平主席指出，这应当是田径赛，而不是角斗赛。



中美关系中的叙事问题

安刚

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几年前第一次提出，但一直没有得到解答，那就是：两国到底在争什么？如果答案不能让理性的人满意，他们难道不该坐下来进行务实的对话吗？

P. 21

当下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并非中美“新两极”

陶文钊

美国对中国将取代其领导地位的担忧是基于严重的战略误解。国际力量格局向多极化转变的道路可能漫长而艰难，但前景是光明的。

P. 24

美国和中国不会真想打仗

詹姆斯·H·诺尔特 (James H. Nolt)

头条新闻总是喜欢暗示说，中美之间的对抗已迫在眉睫。但细究两国的经济关系和实际贸易状况就会发现，对于双方来说，挑起冲突显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P. 29

中美学者太平洋对话

寻找未来

P. 33

《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何亚非

P. 37

澳大利亚伤人害己

龚炯 (John Gong)

P. 40

华盛顿如何疏远了中国的年轻人

李成 (Cheng Li)

P. 45

持久共存所需的规则

何伟文

P. 49

全球复苏，无证据显示与中国经济脱钩

休·斯蒂芬斯 (Hugh Stephens)

P. 53

避免冲突 砥砺前行

张平

元首级接触一直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支柱。11月16日，乔·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举行视频峰会，双方明确表达了共同的愿望，即确保两国日益激烈的竞争关系不会演变成灾难性冲突。

这是抚慰人心的消息。在两位领导人看来，他们的努力不是对彼此的恩惠，而是对世界的责任。从终结新冠疫情，到迫切需要的经济复苏和气候变化问题，中美合作对于应对诸多日益严峻的挑战来说确实是必需的。

在本期《文摘》中，我们的作者探寻着一个关键问题的答案：习拜会所展现出来的政治意愿能不能转化为改善中美关系的具体行动？两国在贸易、技术、台湾和人权等问题上许多看似不可逾越的分歧，以及两位领导人各自国家中的某些政治现实和国内压力，都阻碍着关系的突破。

在这次重要峰会举行之前，中美两国高级外交官和贸易谈判代表通过一系列面对面或视频联系进行了互动，并达成了一些共识。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举行的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双方的气候变化特使出人

意料地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承诺两国将协调应对这一至关重要的全球性威胁。此外，两国政府预计还将放宽签证限制，为记者提供便利，金融和贸易官员们也正在重新评估彼此之间的政策。人们希望，所有这些事态发展都预示着紧张局势的缓解。

然而，许多中国学者认为，除非美方对中国的误解能够得到纠正，否则不确定性将继续困扰双边关系。这或许很难，双方都需要为此付出更多努力。

除了分析习拜会，我们的作者还提供了对中美关系有可能缓和的见解，以及对全球秩序中正在出现的多极化格局的看法，这是从战略上理解中国政府的基础。今年恰逢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历史性投票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50周年，我们的撰稿人详细阐述了中国希望建立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在本期杂志太平洋对话栏目，周波重点讨论了美国从阿富汗撤军问题，这一话题在中国内外都引起了广泛讨论。

我们希望您喜欢本期收集的评论文章，同时一如既往欢迎您的点评。



An exciting journey to
see and **hear** China
first-hand.



thechinacurrent.com [@thechinacurrent](https://twitter.com/thechinacurrent) [#thechinacurrent](https://www.instagram.com/thechinacurrent)



中美元首共同反对“新冷战”



赵明昊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两国元首在视频会晤中表达了反对新冷战的立场。老朋友寻求恢复关系，向前迈进，既接受竞争，又避免冲突。如何做到这一点是大问题。

11月16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视频会晤。此次超出原定时长的会晤是中美元首之间展开的战略性沟通，也是两国管控紧张关系、

探索新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习近平以“老朋友”称呼拜登，强调中美犹如两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需确保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迎头相撞。拜登提出，两国竞争应是公



“

“好的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处理中美关系亦如此。

平的、健康的，要避免竞争演变为冲突。

毋庸置疑，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将会在未来 10-20 年持续展开，这场异常复杂而又注定激烈的大国博弈将决定 21 世纪人类社会的命运。习近平就如何管理中美关系提出三点原则，即“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不久前，拜登政府也曾提出美国并不寻求打“新冷战”，美中两国需实现“长久共存”。作为世界上的两个核大国，即便中美一直在指责和抱怨对方，但它们还是不得不接受“共处”的现实。

“好的外交政策始于国内”，处理中美关系亦如此。习近平与拜登之间实际上存在一种“同情之了解”，双方都在艰难而又坚定地推动各自雄心勃勃的国内政策议程。就在这场会晤之前，拜登签署了《两党基础设施建设法案》，这仅是拜登政府重建中产阶级努力的一小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演说中多次强调的“国内振兴”，也正是中国力图实现的目标。在习近平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正奋力开启中国国家发展的新周期，而为 14 亿中国人创造“美好生活”注定是极为严峻的考验。

习近平对拜登强调，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与合作，既办好各自国内的事情，又承担起应尽的国际责任。习近平认为，地球足够大，容得下中美各自和共同发展；要



习近平强调，中方所提的全球性倡议 对美国都开放，希望美方也能如此。

坚持互利互惠，不玩零和博弈，不搞你输我赢。

为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领导人进一步明确了中美关系当中需要处理的优先事项。第一，中美需深化各层级各领域的交往，推动能够“解决具体问题”的沟通和对话。目前，中美之间已经形成外交安全、经贸财金、气候变化等三大交往渠道，如何让这些不同渠道真正发挥效力是摆在中美面前的共同难题。

第二，要通过中美合作引领国际社会应对公共卫生、能源安全等领域的突出挑战，共同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习近平强调，中方所提的全球性倡议对美国都开放，希望美方也能如此。中美领导人还围绕阿富汗、伊朗核问题以及朝鲜半岛局势进行了深入沟通，

第三，要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北京和华盛顿都认识到，竞争和冲突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肆意而高烈度的竞争有转化为冲突的风险。拜登表示，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习近平希望美方把不打“新冷战”的表态落到实处。

台湾问题是这次中美元首会晤重点讨论的议题，这是有可能引爆中美战争的最敏感因素。美方一些人士一直炒作大陆将在2027年之前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并将能否“保卫台湾”视为中美战略较量的“最前沿”。这让中国方面感到，在未能赢得对华“贸易战”的情况下，美国开始更加恶意指玩“台湾牌”，甚至妄图通过一场战争彻底打断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在台湾问题上，拜登政府似乎已经走到改变“战略模糊”的边缘。布林肯10月底公

开宣称要让台湾当局“有意义地参与联合国体系”，这是对大陆的严重挑衅。就在中美举行元首视频会晤的前夕，布林肯还宣称假如台湾受到攻击，美国将“采取行动”。

实际上，“台独”才是中美共同的“大麻烦”，这是台海局势难以稳定的根源。习近平强调，台湾当局一再企图“倚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这一趋势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习近平称，“我们是有耐心的，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如果‘台独’分裂势力挑衅逼迫，甚至突破红线，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

拜登则对习近平表示，美国政府致力于奉行长期一贯的一个中国政策，不支持“台独”，希望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稳定。无疑，大陆所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与美国所说的“一个中国政策”之间仍存在很大的差异，但中美确保不在台湾问题上陷入有意或无意的冲突，不因台海冲突而“破局”，符合两国各自的长期利益。

总之，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提供了让双方冷静重审两国关系的宝贵机会。应当看到，无论是“脱钩”还是“新冷战”的说法，都不符合中美关系的现实。今年1-8月，中美双边贸易额超过47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6%。这表明中美两国人民的“美好生活”仍是相互依存的。即便中美关系困难重重，也不应放弃“事在人为”的努力。正如习近平所言，未来50年，国际关系中最重要事情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



无疑，大陆所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与美国所说的“一个中国政策”之间仍存在很大的差异。

中美峰会：寻求某种稳定



沈大伟 (David Shambaugh)

乔治·华盛顿大学亚洲研究中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教授

通过双方首次直接面对面地举行“峰会”，拜登总统和习近平主席试图在紧张、恶化的中美关系中搭建一个平台，并设置某种“护栏”来管理竞争关系。双方都表示这是向前迈出的积极一步。

11月15日（北京时间11月16日），在白宫的美国总统乔·拜登与在人民大会堂的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习近平举行了三个半小时的视频“峰会”。此次会晤筹备一个多月，而且超过了原定时长。

两位领导人最近几周都很忙碌，且在国内政治方面取得了成功。拜登总统刚刚结束对欧洲的圆满访问，他参加了罗马G20会议和格拉斯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会晤举行前，他还签署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万亿美元基建法案。至于习近平主席，他主持召开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了重要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所以说，两位领导人都因最近的政治成功增强了信心，不过双方也都需要在外交政策方面取得进展——对双方来说，中美关系是难度最大的挑战。自从拜登就任总统以来，中美两国关系因为各种各样的问题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前两国高级官员线上线下的会晤，以及两国元首之间的两次通话，都未能

阻止双边关系螺旋式下滑。因此，这次峰会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让最高层直接讨论双方的问题。领导人确实重要，因为只有他们有能力去做最艰难的决定，去定基调，去与对方达成较低工作层级难以达成的协议。

拜登总统在开始与习主席讨论时提出：“在我看来，作为美中两国的领导人，我们的责任是确保两国之间的竞争不会演变为冲突，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的。”这样看，拜登在开场白中强调了两点：一是把两国关系定义为“竞争”，二是双方都应负责任地管理竞争，以避免冲突。这并不是美方发出的新信息，“管理竞争”是拜登政府上台后一以贯之的框架，虽然中方明确拒绝了这种描述。

“

这次峰会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让最高层直接讨论双方的问题。

两位领导人直接对话，这个事实本身就被视为稳定因素。双方在峰会后的新闻稿中都使用了隐晦的外交语言，表达了某种积极的暗示。新华社将会晤描述为“坦诚、建设性、实质性和积极的”。新华社还说，“会晤增进了双方相互了解，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美关系的正面预期，向中美两国和世界发出了强有力信号”。对于拜登总统关心的建立防止擦枪走火机制的必要性和相互责任，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谢峰似乎也给予了呼应，表示要“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防止中美关系脱轨失控……关键是要建设性管控，避免激化和扩大化”。从这样的陈述看，中方似乎已经接受美方概念框架中的“管理”部分，但未接受“竞争”部分。

至于两国元首讨论的具体问题，包括了气候变化、全球能源供应、供应链中断、持续不断的新冠疫情、全球宏观经济稳定等全球治理问题。他们还讨论了地区“热点”问题，特别是朝鲜、伊朗和阿富汗。根据白宫的新闻稿，“拜登总统对中国在新疆、西藏和香港的做法以及更广泛的人权问题表示关切”，他还指责中国“不公平的贸易和经济行为”，同时强调有必要维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对于后者，拜登强调了“履行对该地区承诺”的重要性。然而新华社通稿说的是“拜登重申，美方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

双方还暗示有可能就“战略稳定”（代

“

两位领导人直接对话，这个事实本身就
被视为稳定因素。

“

这是件好事，是走向稳定，是为继续讨论
和有望管控分歧打下基础。

指核武器)对话开始进行磋商。最近有报道称，中国建造了数百个洲际弹道导弹发射井（由卫星发现），并且有可能到2030年将部署的核武器增加两倍，这在美国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两国元首还谈到多变而又敏感的台湾问题。这次拜登使用了传统说法，表示美国将“以《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继续坚持‘一中’政策，同时美国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或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企图”。可惜的是，虽然拜登与习近平会晤时在台湾问题上严格照本宣科，但第二天访问新罕布什尔州时，他再次自相矛盾（就像他几周前宣称美国“承诺”保卫台湾一样），声称台湾“应自己做决定，它是独立的”。

习主席重申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但他更进一步表示，“台湾当局一再企图‘倚美谋独’，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华’”。他严厉警告说：“这一趋势十分危险，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焚。”

峰会举行后的第二天，双方宣布同意恢复中断的新闻协议。驻美中国记者将再次获得一年多入境签证，《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也将获准恢复在华业务。中方还同意将被美方拘留的（为数不少中国人当中的）七人遣返回国。

但总而言之，交流看来是富有成效、坦率和建设性的。这是件好事，是走向稳定，是为继续讨论和有望管控分歧打下基础。

元首会晤引领新时期中美相处之道

■ 易凡

北京时事评论员

作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走向受到广泛关注。国际社会对此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高度期待，其成功举行为中美关系未来指明方向。

上周，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成功举行视频会晤。作为 21 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的走向受到广泛关注。此次元首会晤备受世界期待，为中美关系未来指明方向。

中美元首之间的坦诚、直接对话对于两国关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尽管会晤以视频方式举行，此次互动仍具有重大意义。拜登常说“政治说到底取决于人与人的互动”，并常提及过去十年中与习近平主席的长时间交谈。但两国元首都是务实的领导人，借用布鲁金斯学会一份报告的话，两人既不会“沉

“

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可谓“大到不能倒”。

醉于过去”，也不会“悲观看待未来”。在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危机的背景下，中美领导人愿意就一系列战略性问题进行广泛、深入讨论，这本身就有助于为两国之间的复杂关系把舵定向。

尽管两国政府均试图降低外界对会晤成果的预期，但舆论普遍认为，会晤本身将向两国和国际社会发出积极信号。中美合作的必要性不言而喻。众所周知，两国曾携手应对 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在日前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上，中美为扭转全球气候危机开展了有效的协调并达成重要共识。

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可谓“大到不能

“

在国际社会面临多重危机的背景下，中美领导人愿意就一系列战略性问题进行广泛、深入讨论，这本身就有助于为两国之间的复杂关系把舵定向。

“

长期以来，该问题一直被视作中美关系的敏感点，一旦处理不当，就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颠覆性破坏，无论设置什么“护栏”都难以维系两国关系的稳定。

”。拜登总统在9月通话中主动提出希与习近平主席举行会晤，表明美方终于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但笔者也注意到，美国往届新政府通常上台后三个月左右即与中方举行元首会晤，而拜登政府上任后，直至其任期第十个月，中美元首会晤才得以举行。这期间美方高级官员反复强调要“从实力地位出发”与中国打交道，以为中方会屈服于极限施压。然而，中方多次明确表示，特朗普政府的那一套对中国过去行不通，现在和将来也行不通。

会晤开场时，拜登总统面对媒体表示，美方希望为两国关系建立“合乎常理的护栏”。中方将关注这一表态如何体现在行动上。台湾问题将是一大试金石。长期以来，该问题一直被视作中美关系的敏感点，一旦处理不当，就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颠覆性破坏，无论设置什么“护栏”都难以维系两国

关系的稳定。一段时间以来，美政客频频访问台湾、美军在台训练等行为均严重背离了自卡特政府以来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做法，中方就这些问题作出强烈反应理所当然，美方不应感到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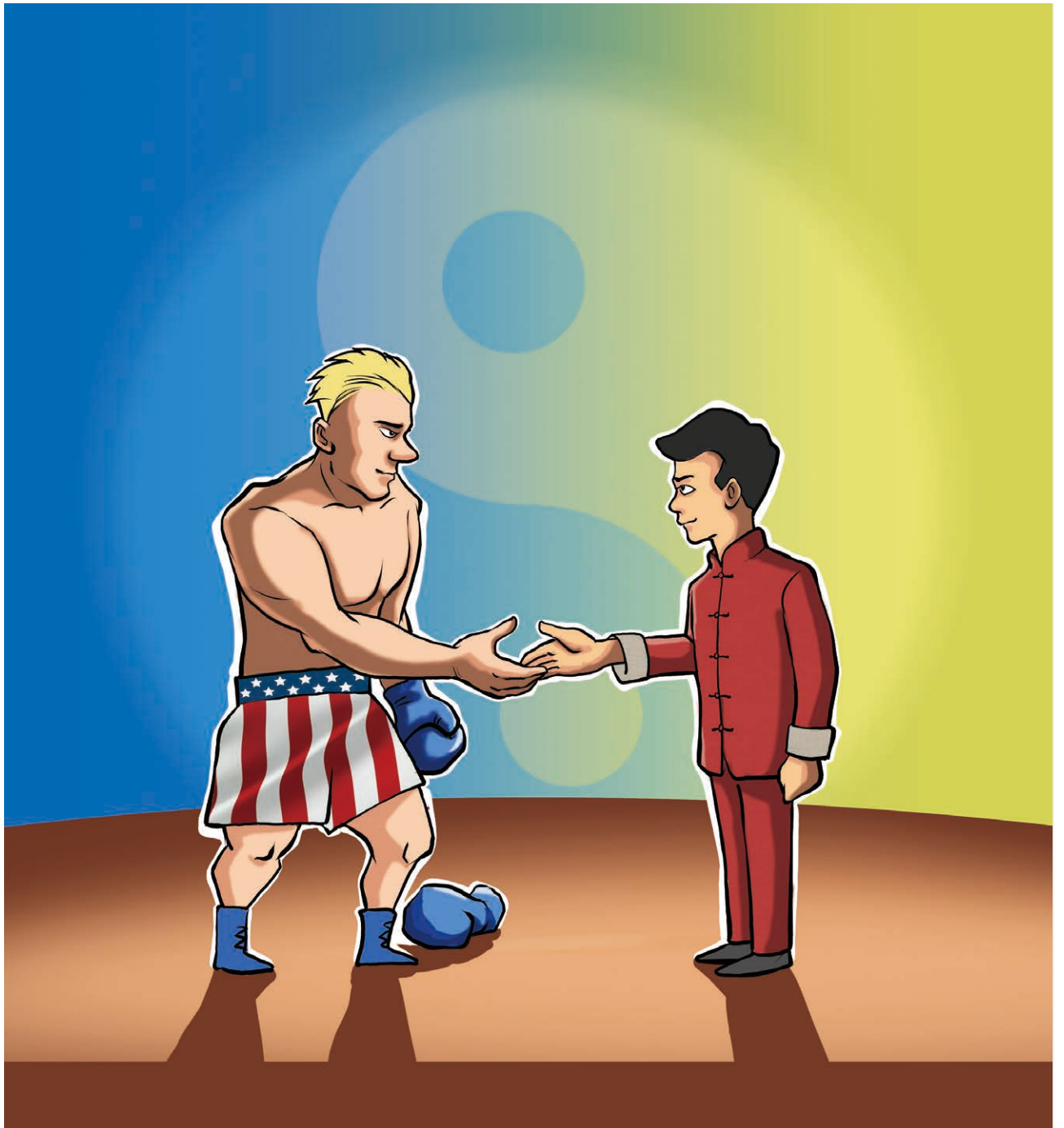
双方在会晤中均强调，应避免有意或无意引发的冲突。笔者也注意到，拜登总统在9月的联大讲话中明确表示美方“不寻求新冷战”，这似乎表明本届政府对华政策中理性的一面在上升。

但正如约瑟夫·奈近期指出，“（拜登）总统的行动表明，他对付中国的策略或许确实受到冷战思维的影响”。美方在跟中国打交道时总把“从实力地位出发”挂在嘴边，这一措辞很难不让人想起美国务卿艾奇逊冷战中针对苏联的政策表述。假如美方当前表态纯粹是为了激励国内实现振兴，中方的反应未必会如此强烈。然而现实恰恰相反。不仅在中国政府看来，在国际社会很多人眼里，“美英澳三方安全伙伴关系”、“四边机制”、“五眼联盟”以及“民主峰会”都指向同一个靶子：中国。美大张旗鼓拉帮结派，恰恰说明其外强中干，其所谓“不寻求新冷战”的表态不过是空洞的言辞罢了。

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仍面临诸多风险，从台海及亚太局势趋于紧张，到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战略稳定存在隐忧，再到人工智能军事化可能导致冲突，不一而足。上述风险均

“

美大张旗鼓拉帮结派，恰恰说明其外强中干，其所谓“不寻求新冷战”的表态不过是空洞的言辞罢了。





中美间应开展良性竞争，看谁能够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能够给本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而不是陷入恶性竞争，迫使各国选边站队。国际社会对此抱有很大期望。

可能使中美两艘巨轮迎头相撞。但明眼人都知道，中美任何一方都承受不起冲突的代价。

既然“新冷战”不可取，那么什么才是正确的相处之道？中方在会晤后发表的消息稿表明，习近平主席向拜登总统提出中美相处应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12字原则。拜登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甚至重申美国不寻求改变中国的体制。诚然，中美双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消除分歧——有些分歧是根本性的。但两国不应在有着共同利益的领域放弃或错失合作机遇，为人类更美好的未来一同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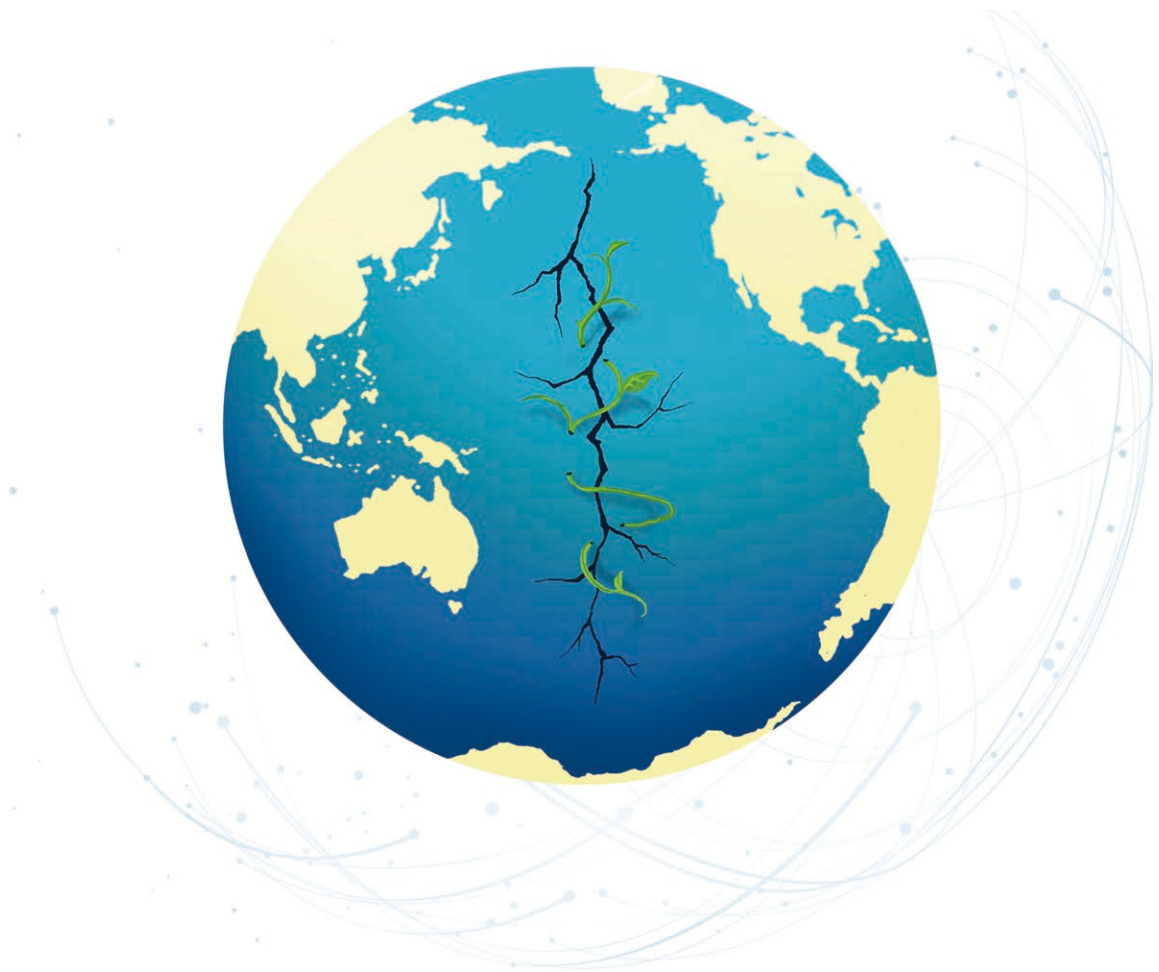
尽管美对华强硬人士不愿承认，但事实证明中美之间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比如推动世界经济实现可持续复苏，保障全球能源安全，战胜新冠疫情。近期，中美在格拉斯哥气变大会上就加强气候行动发表联合宣言，就受到广泛欢迎。世界各国人民都期待着中美共同努力，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新冠疫苗。在引领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中美合作也许不是万能的，但没有中美合作是万万不能的。

近期，美方一直寻求与中方“负责任管控竞争”。如能赋予“竞争”恰当的定义，并善加管控引导，双方有可能激发各自潜力，摆脱零和游戏。中美间应开展良性竞争，看

谁能够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能够给本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而不是陷入恶性竞争，迫使各国选边站队。国际社会对此抱有很大期望。

美方在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中表示，“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并愿进行和平竞赛，让行动作出最后判断。”美现政府应继续遵守而不是背弃这一立场。

此次中美元首视频会晤正值两国完成了重大国内议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六中全会顺利闭幕，对实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意义重大。在大洋彼岸，拜登总统在会晤前签署了跨党派基础设施投资法案。实现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将有助于双方顺利推进国内议程。中方在会晤中提出的中美正确相处之道和双方明确的重点合作领域，标志着一个良好的开端。当务之急是通过具体行动，将两国元首的共识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成果。



久候终至的首脑会晤

■ 柴泉

驻北京时事评论员

在过去了 10 个月之后，习近平和乔·拜登终于安排了会面，这反映出中美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习近平和拜登一度经常见面，而最近的这次视频峰会也许有助于两国关系解冻。

11月16日，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举行了人们期待已久的视频会晤。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他们在会晤时说了什么，而是双方花了如此长的时间才同意举行峰会。到目前为止，拜登就任总统已经有10个月了。

回顾过去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所有首次会晤，这一次推迟的时间之久，仅次于1993年11月19日克林顿与江泽民的会晤。习拜会的推迟可能与新冠疫情有关，但考虑到现代技术所提供的便利，这种说法并不令人信服。其间的阻碍，当是中美之间关系冷淡，首先就是拜登政府在2021年头几个月里的所作所为——在人权、新疆和香港问题上抨击中国，延续并扩大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实体或个人的限制性措施，最重要的是，美国官员在谈及中国或与中国同行交流时，语气中充满敌意和傲慢。

出人意料的是，过去几个月出现了一些变化，为峰会创造了良好的氛围。

两国元首的预热互动是一个积极开端。9月10日，两位领导人通了电话，同意责成双方工作层面的人员加紧努力进行广泛的对话，为中美关系向前发展创造条件。11月9日，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在纽约举行2021年度晚宴，习近平和拜登分别致了贺信。就在此次峰会举行的前五日，两国在格拉斯哥

“

两国元首的预热互动是一个积极开端。

联合国气候大会结束时发表了一份出人意料的联合声明，同意进一步合作应对气候变化。据报道，这一进展受到两位领导人的推动。

此外，美国领导人和官员们对中国的语气也有所软化。拜登9月份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表示，美国无意遏制中国，也不会搞“新冷战”。10月4日，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表示将启动对华关税豁免程序，并承认脱钩是不现实的。她表示希望与中国重新挂钩，以实现“长久共存”。11月1日，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表示，美国将考虑与中国“以互惠方式稳定部分关税，最终也许会降低关税”。习拜会举行的前几天，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在接受CNN采访时表示，美国不再试图改变中国，同时正在探索与中国共存的方式。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司法部放弃了对中国电信领军企业华为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程序。在加拿大被监视居住1000多天后，孟回到了中国，困扰中美关系数年的最棘手问题之一得到了解决。

美方的政策微调和中方的善意回应为这次会晤铺平了道路，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一些人认为，美国需要中国在气候变化、核不扩散、阿富汗等问题上合作，可是这些问题并没有紧迫到需要举行峰会的地步。重要的是，促成此次首脑会晤的因素也许是两

“

此外，美国领导人和官员们对中国的语气也有所软化。



同样, 尽管中国表示将坚定维护其核心利益, 习近平仍希望稳定同美国的关系, 防止事态失控。

国元首都认为, 即使两国关系曲曲折折, 首脑外交也不能中断。

在许多美国政界人士眼中, 竞争并不等于对抗, 既合作又竞争是可能的。他们认为, 只要不发生对抗, 对手之间举行峰会应该不是问题。即使在冷战期间, 美苏领导人也曾多次举行会晤。

拜登上任不久即公开表示, 美国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 而是会与中国进行“激烈的竞争”。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他的首次外交政策演讲中宣称, 美国与中国的关系“应该竞争的时候竞争, 可以合作的时候合作, 必须对抗的时候对抗。”。

同样, 尽管中国表示将坚定维护其核心利益, 习近平仍希望稳定同美国的关系, 防止事态失控。习近平曾说: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 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在9月与拜登通话时, 习近平说, “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 而是一道是否搞好的必答题”, 表达了他希望中美关系保持正常发展的愿望。

从他与世界各国政治领导人——包括美国前总统——的会晤记录看, 习近平是擅长峰会外交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 他对峰会外交是安抚美国领导人、处理分歧与危机的有效方式感到怀疑。

此外, 从私人关系的角度看, 举行一次

首脑会晤也是必要的。在拜登任奥巴马政府副总统期间, 这两位领导人有过密切的个人接触, 他们曾多次会晤, 一谈就是几个小时。所以说, 他们在拜登任总统10个月后还没有举行正式会谈是不正常的。拜登上任以来, 几乎会见了所有主要国家的领导人, 与一些人还数次见面, 其中包括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日本首相菅义伟。6月份访问欧洲期间, 拜登甚至会见了普京。

危机管理的必要性也推动了此次峰会的举行。随着台海紧张局势升级, 双方迫切需要进行最高级别的沟通。拜登一个月内曾两度誓言要协防台湾, 最近一些国会议员访台, 与台湾加强军事关系, 都给中国留下美国插手台湾的印象。与此同时, 中国军机频繁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引发美国对武统迫在眉睫的担忧。为了防止误解误判, 两国领导人有必要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探究对方的想法, 即使只是视频交流。

如果用几年或几十年的时间范围来衡量, 最近这次峰会的意义也许没有大到足以决定中美关系的未来。但峰会安排的难度, 说明了以竞争、合作和对抗并存为特征的双边关系的复杂性。

不过, 这次峰会也许有助于融化坚冰, 只要双方都重视“斗而不破”的政治智慧, 未来几年也许还会有更多这样的事情发生。



而且没有证据表明, 他对峰会外交是安抚美国领导人、处理分歧与危机的有效方式感到怀疑。



中美缓和：不能高估，也不应低估



达巍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
国际关系学教授

双方似乎都意识到，两国关系模式的转变不可避免，而且已在进行当中。如果失控，如果滑向对抗，任何一方都不会受益。习近平主席指出，这应当是田径赛，而不是角斗赛。

中美关系自 2018 年 5 月特朗普政府发动贸易战以来不断下滑，2021 年 1 月拜登上任后也一直徘徊不前，如今终于出现了一些积极势头。华为公司高管孟晚舟被释放回国，拔出了中美关系中一根深深的“刺”。两国高级外交官在苏黎世举行了富有成效的会晤，贸易、气候和军事团队也开始恢复接触。特别重要的是，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有望在今年年内举行线上峰会。那么现在的问题是，北京和华盛顿能走多远？应当如何走？

显而易见，当前中美关系的缓和并不能把我们带回 2018 年之前。回望历史，50 年前，由于华盛顿和北京都需要制衡苏联威胁，两国在现实主义思维推动下打破了双边关系的坚冰。约 30 年前，美国试图在冷战后向全球扩展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模式，而中国也希望搭上全球化的快车实现现代化，两国关系在“接触”战略下得到极大深化与拓宽。经过以上两个阶段后，中美关系在 2017 年底走入 50 年来的第三个阶段，“竞争”成为最突出的特征。没人知道这一阶段将持续多久，但显然目前的“回暖”是在“竞争”框架内的战术调整。与很多人一样，笔者十分怀念过去相对积极的中美关系。但这种感情带来的不切实际的期待，可能导致我们高估中美关系此轮回暖的战略意义。实际上，把握当前中

“

没人知道这一阶段将持续多久，但显然目前的“回暖”是在“竞争”框架内的战术调整。

美关系，也许更需要清醒的头脑和对现状恰如其分的评估。

中美关系近期的积极势头可能是两国关系重构过程中的重要一步。中美关系从 2017 年底开始从原来的“接触”框架向“竞争”框架调整，随后两国关系迅速恶化。四年过去后，双方似乎都认识到，两国关系整体框架的调整已不可避免，但竞争失控并滑向对抗和冲突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之间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田径赛”，而不是“你死我活的角斗赛”。美方官员也强调要进行“不至引起灾难的竞争”，要给中美关系装上“扶手”。近期中美关系回暖，实际上是双方试图控制竞争的性质、范围与程度。把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的恶化与近期中美关系的回暖拼接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完整的“竞争”框架。

2022 年秋天，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 20 次全国代表大会，美国也将举行至关重要

“

四年过去后，双方似乎都认识到，两国关系整体框架的调整已不可避免，但竞争失控并滑向对抗和冲突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华盛顿与北京在双边关系上最紧迫的议程，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全面激活两国的官方对话。

的中期选举。两国重要的国内政治议程安排意味着，如果一切顺利，本轮回暖势头大概也只能持续到明年秋季。在未来的大半年内，中美两国有很多事情要做。

华盛顿与北京在双边关系上最紧迫的议程，是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全面激活两国的官方对话。哪怕这些对话极为困难，短期内难以取得成果，也要恢复对话的气氛和习惯，让两国各领域的官员即便在高度紧张的气氛下也能保持高频度对话，这对管控中美竞争至关重要。

中国很多人认为，当前中美关系的缓和是中方前一阶段对美坚持强硬立场的成果。



如果双方都只是按照自己坚信的逻辑推动己方政策，这轮缓和恐怕很难持久。

这与美方的认知相去甚远。美国方面很多人认为他们才是掌握战略主动的一方，目前两国关系正按照美方设定的目标和节奏发展。无论谁对谁错，中美两国都需要更加准确地把握对方的心态，如果双方都只是按照自己坚信的逻辑推动己方政策，这轮缓和恐怕很难持久。

拜登政府需要尽快采取行动，纠正上届政府遗留下来的一些明显错误的政策。在人文交流、关税等问题上固执己见，对中国的影响有限，对美国国际形象的影响却是深刻的。此外，拜登政府可能需要更加清晰地解释“战略竞争”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概念过分模糊，很多中国人认为，美方用这个术语表述自己的战略意图实际上是不够诚实的。当然，中国在反对以“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的同时，也需要尽快清楚地表明自己支持何种对中美关系的定型与概括。

在加拿大被扣押近三年后，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于2021年9月25日返回中国。



中美关系中的叙事问题



安刚

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几年前第一次提出，但一直没有得到解答，那就是：两国到底在争什么？如果答案不能让理性的人满意，他们难道不该坐下来进行务实的对话吗？

中美关系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但尚未形成双方均能接受的新叙事。根本原因是，两国结构性矛盾加剧，激烈斗争成为彼此关系的鲜明特征。斗争遍布从经贸、军事、科技到人文、交通等各个领域，压倒合作性且主导着两国关系的发展演变。不仅两国关系前景的不确定性很大，而且双方对事情何以至此、该如何重新定义彼此关系和驾驭相互矛盾，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分歧。

美方从其一贯的权力之争视角出发，深度推进全球战略调整，集中优势资源布局对华战略竞争，并持续进行国内国际层面的动员，由此正在形成系统性的叙事。这套叙事的发展迄今已经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2015年起，以经贸、南海问题为引线，美国国内战略界展开对华政策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鼓吹“过去历届美国政府的接触政策归于失败”的论调占据上风，“重修对华大战略”的呼声响彻云霄。

第二阶段，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战、科技战乃至意识形态攻势，把中国定性为首要的“战略竞争者”，污名化为全球经济体系

中的“不公平竞争者”、“剽窃者”和国际体系的“修正主义者”，将美中矛盾诠释成“威权主义与自由世界”的“殊死之战”，甚至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在美国国内进行遏华反华动员。不过，“文明冲突”、“新冷战”等武断、极端、非理性的判断也受到美国理性学者的质疑。

第三阶段，拜登上台后进行对华政策审议，基本延续特朗普时期的叙事，将与中国的关系定义为“激烈战略竞争”，同时举共同价值观旗帜，同盟友伙伴紧密协调立场，把过去局限在美国国内的动员推进到国际层面。但也承认无法与中国脱钩，承认美国继

“

不仅两国关系前景的不确定性很大，而且双方对事情何以至此、该如何重新定义彼此关系和驾驭相互矛盾，存在着巨大的认知分歧。

续领导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议程离不开中国的合作，提出要设立“护栏”，以“竞争”、“对抗”、“合作”区隔两国关系议题，加强管控，避免引发“灾难”。

目前美国战略界对华政策辩论的余音仍在“绕梁”。兰普顿、李侃如、董云裳、冯稼时等学者近期密集发声，为1970年代开始的对华接触政策辩解，质疑目前的美国对华外交是否“过激了”。新书《接触中国：中美关系50年》是他们观点的集大成者，指出“接触政策并没有失败”，而是给美国带来利好，比如“加速冷战终结”、“中国融入国际体系”、“全球减贫”、“亚太和平红利总体减少美军费开支”，等等。

他们还辩称接触政策非出于改造中国的目的，也非一次过的选择，而是历届美国政府在应对诸多事件过程中所做决策的累积迭加，是“面对机会和可能性的回应”。他们也指出目前的美国对华叙事忽略了中美接触始于战略安全议题这一事实，忽略了对华“两面下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这种辩解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战略界理性派人士对前一阶段对华政策调整过激和他们一度被决策圈疏离的回击，自然激起强硬派的反弹。著名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者米尔斯海默10月19日在“外交事务”网站发文

“

拜登政府拒绝承认美国就是要压制中国的崛起，也明确反对“新冷战”，目前正同中方加强外交沟通，淡化对华关系中的“对抗”色彩。

“

涉及中国会是什么基调，能否调整出一套完整和相对理性的叙事，且拭目以待。

强调，过去美国被理想主义驱使而非按现实主义逻辑行事的对华政策就是失败了，中美竞争和冲突不可避免。

尽管不同派别围绕该如何评价过去的接触政策仍争论不休，美国国内已就必须对华开展全政府、系统性的战略竞争达成共识这一事实仍是事物发展的主要方面，并且这种共识还在延伸：认识到美国已无法在“应对全球挑战”和“应对大国竞争”两个方向中做选择，必须两者同时进行。

美国新的对华叙事还在演变，结论仍不够明晰和充分，主要卡在“新的对华政策目标究竟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上。拜登政府拒绝承认美国就是要压制中国的崛起，也明确反对“新冷战”，目前正同中方加强外交沟通，淡化对华关系中的“对抗”色彩。理性派学者提出新的政策应致力于实现“公平对等”，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还有待阐述。他们所提避免“新冷战”的具体方案也寡淡无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国政府的关切。

拜登政府一系列官方报告将于今年底落地，包括《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以及新版《印太战略报告》等，涉及中国会是什么基调，能否调整出一套完整和相对理性的叙事，且拭目以待。

随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壮大和中美关系性质的实质改变，中国也在努力探索对美关系的新叙事，同样也历经了几个阶段。起初是

相对理想化的，在拒绝美方战略要人抛出的“两国集团”（G2）论调后，致力于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试图形成一种中美双方共同接受的叙事框架。

接着是对美方的战略调整做出强烈反应，同时也在顺着过去若干年处理对美关系的思维惯性施加外交影响。在此过程中，“斗争精神”越来越被强调，斗争实践及其形成的国内动员效果持续推进，逐步树立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与美国打交道的信心和视野——这种视野是全球性的。然而，由于形势的流动性过大，中美摩擦持续不断，美方的对华政策审议也未完成，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模糊”正在消散，中方仍无法形成新的完整叙事。

在与美方的外交沟通中，中方明确反对以“竞争”来定义两国关系。在笔者看来，这是在拒绝用“竞争”或其他词来简单界定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也是在拒绝被美方强加的叙事，拒绝美方把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推卸给中国，拒绝美方拼凑西方对华政策统一阵营的企图。

但这不等于否认中美关系就不存在竞争性。对于中美关系中的竞争，比如在经贸、科技领域，本应该也可以从提高全人类福祉的角度出发，引导其朝着良性方向发展。但美国单方面用“竞争”来简单定义中美关系，客观上形成一种“话语陷阱”，一旦中方的叙事进入这个陷阱，两国处理对对方关系的所有资源和舆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朝着竞争方向调动，潜藏在社会层面的情绪被彻底激发，恶性互动全面升级，从而不可避免地滑向“新冷战”深渊。

中国对美关系的新叙事到底该怎么书写，是需要继续研究和讨论的。

“

照目前路数发展下去，一方坚持“竞争内核”，一方坚持“合作为主”，辩论进入死循环，不大可能达成共识。

作为中美斗争的一部分，叙事之争早已在两国之间展开。从贸易战到新冠疫情及其溯源问题，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安克雷奇对话以来的交锋才是主线。照目前路数发展下去，一方坚持“竞争内核”，一方坚持“合作为主”，辩论进入死循环，不大可能达成共识。

但这并不意味着两套叙事完全平行没有交叠。关于如何定义中美关系，两国不断有学者主张使用“竞合”的概念。关于双方应争取达成什么样的关系状态，拜登政府新近使用了“持久共存”，双方都有学者希望“和平共存”局面能够生成，有人指出两个大国要想实现“和平共存”，必须相互重新作出具体承诺。与此同时，无论在官方、学术还是民间层面，双方都承认保持交流、管控分歧和在全球议题上开展合作的重要性。

叙事之争背后更需要解决的更深层次疑问是，两国到底在争什么？这个问题自几年前提出以来始终不能形成定论。两国并非在争霸权地位，因为中国绝无取代美国主导世界之心。似乎也不是在争发展空间，美国固然要压制中国崛起，但这又并非其对华战略的全部。如果美方无法为“战略竞争”提供令世人信服的理由，是不是该坐下来更好地沟通，放下一些臆测，消除一些误解，使新的政策及相关叙事尽量靠近客观事实？

当下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并非 中美“新两极”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美国研究所研究员

美国对中国将取代其领导地位的担忧是基于严重的战略误解。国际力量格局向多极化转变的道路可能漫长而艰难，但前景是光明的。



在当下解释中美关系的理论中，一种比较时兴的说法是“权力转移论”。这一理论的始作俑者是美国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他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把中国和美国认作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认为美国的权力在向中国转移，而两国关系恰恰符合他提出的新兴国与守成国关系的理论。于是，中美两国及国际上掀起“修昔底德陷阱热”，有学者进一步发挥，根据中美两国GDP总量越来越接近和与别国拉开距离的事实，认定现在国际间的权力结构是中美“新两极”“呼之欲出”，甚至说现在已经形成中美“新两极”，2020年是其“元年”。笔者认为，这种看法不符合当下国际格局的现实，有可能产生误导。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需要回答以下相关问题：

第一，全球化导致了国际政治权力的集中还是分散？

虽然现在存在一股逆全球化潮流，但它挡不住当代全球化这一大趋势。现实的答案是肯定的，即全球化导致了权力分散。

首先，全球化销蚀了国家的一些主权。在全球化过程中，各国都会让渡一部分主权，同时也享受别国让渡的主权。例如，关税自主曾被认为是重要的国家主权，但现在，所有加入WTO的国家都要按其规定减让关税，同时各国也都可以享受别国减让关税带来的好处。

其次，国际组织和条约对国家主权形成制约。比如巴黎协定，所有加入的国家都要自主提出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这就是对主权

“

现实的答案是肯定的，即全球化导致了
权力分散。

“

越来越多有实力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到国际政治中来，如跨国公司、恐怖组织、毒品卡特尔等等，它们在国际上享有的权力远大于从前，而国家对它们的控制有限。

的约束。特朗普退出巴黎协定就是觉得对美国的限制太多了，“损害了美国的主权”。

再次，越来越多有实力的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到国际政治中来，如跨国公司、恐怖组织、毒品卡特尔等等，它们在国际上享有的权力远大于从前，而国家对它们的控制有限。“911”恐袭事件是恐怖组织对国际政治破坏的突显。特朗普要求美国公司与中国市场脱钩，但鲜有公司这样做，说明跨国公司对美国政府的权力形成制约。

最后，技术进步也对国家权力造成冲击，比如互联网，人们从中获得信息的自由度是以前不可想象的，而随着人工智能、

量子力学等技术的发展，这一趋势会越来越明显。

全球化对各国主权造成的侵蚀和制约，在世界各国都是存在的，国际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的国家也在所难免。

第二，应当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格局？

美苏两极格局崩溃后，美国政界和学界很多人认为世界进入美国“单极时刻”，而中国学者大多称为“一超多强”。中国与俄罗斯曾几次发表联合声明阐述立场，如1996年4月的联合声明指出，当今世界多极化趋势在发展，但是世界并不太平，



- ▲ 10月30日至31日，世界20个主要国家的首脑在罗马举行了G20首脑会议。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通过了《罗马宣言》，强调多边主义在寻求共同有效解决方案方面的关键作用，并同意进一步加强共同应对疫情，为全球复苏铺平道路。



美国的盟国关系也与当年大不相同，在一些问题上（主要是安全、价值观）盟国仍追随美国，但在更多方面（尤其是经贸）它们也在寻求各自的利益，对国际事务有自己的主张和追求。

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存在，集团政治有新的表现。声明还提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1997年4月的声明又强调，中俄将努力推动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和国际新秩序的建立，以回应时代和历史的迫切要求。事实上，当下的国际权力结构正处于转型中，即从美国单极向多极转变，但这一转变将是长期而缓慢的过程。

第三，多边主义会不会导致两极格局？

答案也是明确的：不会。多边主义是在冷战结束、美苏两极格局崩塌以后逐渐形成的，到本世纪，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实力越来越强，多边主义在国际政治中发挥出越来越大的威力。以往小国在国际事务中没有发言权，于是，中小国家联合起来结成地区组织，争取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非盟和东盟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尤其东盟国家集体奉行“东盟中心地位”原则，发起并领导了10+1、10+3、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等系列机制，不受大国左右和摆布，成功担负起地区事务领导者的角色，并在周边大国之间充当战略中间人。“东盟中心地位”是在



当下的国际权力结构正处于转型中，即从美国单极向多极转变，但这一转变将是长期而缓慢的过程。

东盟数十年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并行之有效的，是保持地区稳定的有益实践。国际关系中的这种实践与两极格局是格格不入的，它是多极格局的一种体现，联合国及其下属国际组织更是奉行多边主义。

第四，今天存在产生“新两极”的条件吗？

美苏两极格局的产生有两个背景，一个是反法西斯战争，美国的综合国力在战争中得到极大提升，并形成遍布世界各地的同盟体系，苏联的力量尤其是军事实力也在战争中得到大发展，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大国，影响力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另一个背景是冷战，在冷战中形成了华约、北约两大集团，两极格局实际上是两个集团的对抗。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中国的外交是结伴不结盟，不针对第三方，根本不存在形成集团的问题。

同时，现在的国际关系比两极对抗时期复杂得多。美苏之间没有现在中美这样广泛而深刻的相互依赖，美国的盟国关系也与当年大不相同，在一些问题上（主要是安全、价值观）盟国仍追随美国，但在更多方面（尤其是经贸）它们也在寻求各自的利益，对国际事务有自己的主张和追求。

当前，在综合国力方面美国仍保持着优势，战略平衡方面则非美俄莫属，它们的领先地位还会长期保持。科技创新方面，除了美国，欧盟、日本也具有相当优势。中国的主要优势是GDP增长势头和潜力，但中国

“

多极世界是一个动态概念，21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不会是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两个国家手中，更不是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霸权国家。

经济也面临挑战。如今应对气候变化为全世界所关注，中国也作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实现“双碳”目标对任何国家都是一件难事，中国尤其困难，因为中国GDP能耗是世界平均能耗的1.5倍。再如老龄化，中国进入老龄社会时的人均GDP比发达国家低得多，这意味着应对老龄化的资源相对紧缺，而老龄化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已经开始显现。

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导致了国际政治中的权力分散趋势，这也是美国霸权相对衰落的主要原因。但同样清楚的是，美国失去的那

部分权力并没有完全转移给中国，一个明显的例子是G20，它说明为应对金融危机，更多新兴经济体参与了对国际金融和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的决策。

多极世界是一个动态概念，21世纪的国际政治格局不会是权力高度集中在一两个国家手中，更不是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新霸权国家。中华民族复兴的目的不是取代美国，美国担心中国挑战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这是严重的战略误解和误判。“权力转移论”不是观察和分析中美关系的恰当模式，“修昔底德陷阱”之说可以休矣。



▲ 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国家领导人于2021年4月24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会议。

美国和中国不会真想打仗



詹姆斯·H·诺尔特 (James H. Nolte)

纽约大学客座教授

头条新闻总是喜欢暗示说，中美之间的对抗已迫在眉睫。但细究两国的经济关系和实际贸易状况就会发现，对于双方来说，挑起冲突显然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在和平时期，有各种方法可以用来评估战争的风险，然而，大多数学者的关注重点却是语言和表面行为。语言和姿态并不值钱，它们既是外交工具，也是一种国内政治通货。西方媒体认为，中国在南海和台湾海峡是挑衅者，而按中国的说法，倒似乎是美国及其盟友急于在中国沿海的这两个地区开战。大多数西方媒体都认定中国是煽动者，中国媒体则把西方穿越“中国的”海域视为前所未有的挑衅。出于国内政治目的，双方都在夸大威胁。但这实属无事生非。

很多报道都声称，中国大陆“挑衅性地侵犯”台湾的“防空识别区”，仿佛那是某个国际公认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边界。而实际上，它只是台湾山顶雷达的扫描区域，其中相当一部分覆盖的是国际水域，在那里各国都可以自由航行和飞越——正如美国及其盟友常常宣称的那样。这个“防空识别区”还有一大部分覆盖中国大陆管区。如此一来，中国的例行训练飞行可以是“侵犯”，而西方海空军在中国周边的类似活动却被说成对中国的合理“遏制”。事实上，双方的行动都是由来已久的惯例，其他的不过是文字游戏。



一个面临此等脆弱性的国家是不太可能破坏贸易体系的，这个体系曾让它摆脱贫困，并跻身全球经济前列。

美国和中国都不会轻易让战争发生，客观原因双方却很少阐明。首先，这两个全球最大经济体仍承诺建设相互依存的全球贸易投资网络。到目前为止，中美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依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哪怕是一场有限的武装冲突也会摧毁两国经济，更别提全面战争了。

虽然美国自从二战以来打过很多场战争，但美中两国现在的口角完全不同于美国与前苏联的冷战，更不用说热战了。真正的冷战涉及贸易中断，美苏冲突开始减弱，也是因为上世纪70年代贸易的恢复。冲突最终结束，是由于苏联在全球经济中利益增大，这加速了它的崩溃，尤其是在面临石油和天然气价格波动的时候。此外，自从冷战开始以来，美国的战争都发生在对全球经济无足轻重的国家。事实上，这些战争推动了美国企业中所谓军工联合体（MIC）的发展——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在他的著名演讲中告诫人们警惕军工联合体的影响力。

今天，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促进和平，因为大多数现代产品都需要庞大的全球供应链所提供的物品。没有哪个国家的经济能够经得起贸易大中断，而不会出现灾难性的生产瓶颈、通货膨胀和大规模失业。新冠疫情带来的

破坏已经凸显了这一教训。目前生产瓶颈问题正通过电子电路、航运、纸制品等各行各业挤压着全球经济，而与中国开战将产生更大的破坏性。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占有最大份额，它本身也依赖大量重要物资的不间断进口，其中包括电路、石油和天然气、铁矿石、煤炭、铜，甚至粮食。西方媒体常把南海和台湾海峡称作重要的国际航道，但这种“重要”是对谁而言呢？美国经由这片水域的大部分贸易都流向中国自己，而日本和韩国等美国盟友的贸易线可以在战争期间绕道菲律宾以东。但是，如果这些路线被战争封锁，中国自己的海洋通道就会严重受阻。而且中国大部分贸易是与美国及其盟友进行的，不管怎样它都可能遭到禁运。一个面临此等脆弱性的国家是不太可能破坏贸易体系的，这个体系曾让它摆脱贫困，并跻身全球经济前列。



美国和中国都不会轻易让战争发生，客观原因双方却很少阐明。

美国及其盟友拥有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网，拥有无与伦比的海空力量，它们才似乎更有能力对抗中国，而不是中国反对它们。但美国由金钱驱动的政治受两党大企业金主的支配，这些大企业又依赖与中国的买卖。当然，从全球武器销售中获利的军工联合体因为口水战而发财，这对它们来说是极好的广告。尤其是，最近美国从阿富汗和其他战争中撤出，如果没有“中国威胁论”，武器销售就可能萎缩。这种想法很可能是最近宣布澳英美安全协议（AUKUS）的动因，通过该协议，美国和英国将向澳大利亚提供它们的核潜艇技术。

但另一边是更强大的美国金融和工业企业游说团体，它们与中国有大规模的贸易和投资。在华美国企业销售的产品比美国公司出口到中国的产品多好几倍，许多美国公司在中国赚取的利润比在本国还要多，一旦利润丰厚的中国业务中断，它们将蒙受巨大损失。虽然世界上许多媒体反复强调所谓的中国侵略威胁，但华尔街仍对庞大的中国市场扩大准入这一前景垂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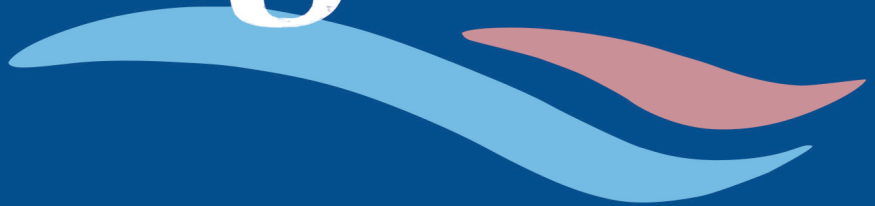
三尺。美国企业大亨们不会在战争迫在眉睫之际投资，他们与太平洋两岸的政客都有密切接触，故而也许比普通民众更了解和平经商的因由。

此外，如果中国真如二战前的日本和德国那样计划发动一场侵略，那它的武装速度也远远没有达到必要的程度。中国武器开支占GDP的比重低于美国，也远低于冷战期间的任何一个大国。尽管如此，中国仍是世界上军费开支第二大国家，但要挑战世界超级大国是远远不够的，尤其还要考虑到其他主要工业强国都是美国的长期军事盟友。与美国和它的许多盟友相比，中国受过军事培训的人口比例也要小得多，近年它在这方面的支出和培训都没有增大加快。即使面对台湾这样的中等军力，中国也没有投资大量的两栖、海军和空军力量，而这些是对台湾发起一场诺曼底登陆式进攻所必需的。在其他文章中，我分析过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难度。如果现在这种情况下都困难重重的话，那么“中国威胁论”又从何说起？就目前来说，只是一堆空话罢了。



虽然世界上许多媒体反复强调所谓的中国侵略威胁，但华尔街仍对庞大的中国市场扩大准入这一前景垂涎三尺。

The Pacific Dialogue



The Pacific Dialogue is a new way to virtually connect thought leaders across the Pacific Ocean to continue frank and direct conversations during this difficult time.



■ 周波

“

从总体上说，美国军队仍然比中国军队强大，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用不着同美国在中国周边以外的地区竞争。

“太平洋对话”是一档让思想领袖们探讨复杂全球问题的节目。周波曾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42年，退役前为大校军衔，如今是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研究员。2021年9月15日，“太平洋对话”主持人、中美聚焦网站特约编辑周柳建成与周波对话，了解他对阿富汗、南海以及中美两军沟通等问题的看法。

周柳建成：

您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谈塔利班接管阿富汗的“速度”和“范围”，以及此事在西方引起的反思。中国如何汲取前车之鉴来获得成功？您又是如何衡量成功的呢？

周波：

国际社会亲眼目睹了美国主导的对阿富汗长达20年的军事干预是怎么失败的。值得欣慰的是，阿富汗人民对中国人没有不好的记忆，因为历史上，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阿富汗，与那些远道而来的侵略者是完全不同的。这就为中国在阿富汗的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什么阿富汗人相信中国人民？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在政治上不偏不倚，值得信赖，即使在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时期，双方关系也非常的融洽。所以说，中国是值得被信任的。此外，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中国拥有首屈一指的基建能力和工业能力，而阿富汗人又恰好是邻居，那为什么不帮帮他们呢？

周柳建成：

21世纪初的时候您去过阿富汗，距离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打响没多长时间。您在当地见过人们遭受的苦难吧，那些我们都熟知的、媒体报道的苦难？

周波：

那是我一生当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国家被战争毁成那个样子。我看见山上的房子，很怪，所有房子，一栋接一栋，都没有门，也没有窗户，那种样子很是怪异。我们为阿富汗的医院提供医疗援助，当时喀布尔最好的医院里只有一台医用血压计，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住在洲际酒店，这是当时喀布尔最好的酒店之一。但我的房间天花板墙皮往下掉，不得不用木头撑着。我们乘电梯的时候，电梯突然就动不了了。所以，喀布尔这间最好的酒店我们都无法住。我们大家看到的，至少在电视上看到的，就是一场不停实时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

“

阿富汗战争也许是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的结束，也许是美国在全球军事撤退的开始，但毫无疑问的是，它是美国与中国在亚太展开激烈竞争的开端。

周柳建成：

我们从电视看到，美军一架 C-17 要从喀布尔机场起飞，人们紧紧抓住机身，等飞机升空之后人掉了下来，这会让您有什么感想？

周波：

这是我见过的最惨画面。我不由得想，这个国家怎么会陷入这般境地。不应当这样啊！纵观历史，阿富汗文明是璀璨的，我甚至记得大英博物馆里有阿富汗文明的展览。而如今人们所知道的阿富汗，要么是相互残杀，要么是抵抗外来入侵。什么导致了这种悲惨的局面呢？是战争，是美国和北约领导的“没完没了的战争”。我在想，现在的撤军，是否意味着美国及其盟友把注意力转到别的地方？它们会不会把资源调配到那个地区，去重新制造我们在阿富汗遇到的问题？美国的盟友们应当从阿富汗战争中吸取教训。阿富汗战争也许是美国领导的全球反恐战争的结束，也许是美国在全球军事撤退的开始，但毫无疑问的是，它是美国与中国在亚太展开激烈竞争的开端。

周柳建成：

美国的一些退休高官，包括退役中将卡尔·艾肯伯里，都表示了新的担忧，认为美中两国之间的军事危机沟通系统，往好里说是不可靠，往坏里说是根本不存在。而且，他们指责中国这些年来在一些关键节点拒绝沟通。这一切与您对这些事件的了解相符吗？

周波：

我本人和卡尔·艾肯伯里是认识的。我同意这种危机管理并不可靠，但其背后的原因又

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因为美国在中国的家门口挑衅。事实上，是美国的军舰经常来到这边，几十年来，这一直是个问题。中国在战略层面上表示，说你至少得减少这一类侦察或监视，最好是完全停止，这样困扰双方互动的问题才会消除。然而美国人的做法是，“不，我们就是要挑战你过度的海洋申索，但你必须要确保我们的安全”，这怎么可能？

周柳建成：

南海一旦发生军事对抗，是否会引发其他冲突和行动，包括禁运？

周波：

很可惜的是，这种情况已经出现过了。例如 2001 年，我们发生了军机相撞。2018 年，中国和美国的两艘军舰险些撞到一起，中间只差了 41 米。但隧道的尽头仍然有一丝光亮。去年 10 月，中国国防部和五角大楼举行了“危机沟通工作组会议”。我很高兴“危机”这个词被提到。他们谈了“危机”的概念，最重要的是，他们谈到危机的预防。但固有的问题是，美国船只频繁地进入南海和台湾海峡，摆明了他们是想挑战中国。这非同寻常的一点是，美国军舰在世界各地航行，挑战其他国家所谓的“过度海洋申索”。但它挑战中国不一样，甚至在开始行动之前，他们就已经宣布要这样做了。

周柳建成：

美国总统的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今年会见了杨洁篪。中国已经阐明了自己的应对气候变

“

然而美国人的做法是，“不，我们就是要挑战你过度的海洋申索，但你必须要确保我们的安全”，这怎么可能？

“

没错，从总体上说，美国军队仍然比中国军队强大，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用不着同美国在中国周边以外的地区竞争。

化路线图。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将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举行。假如不是气候变化，那么中美两个主要经济体兼大国，能够在哪些问题上为人类寻找前进的道路呢？

周波：

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领域可以合作。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舍曼访华期间，曾提到就朝鲜、伊朗、阿富汗和缅甸问题进行合作。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似乎只希望中国在它感兴趣的领域合作，而在其他一些领域继续与中国对抗。没错，竞争是人性的一部分，但合作难道不是人类本性的一部分吗？我个人认为，合作而不是竞争，才是我们灵魂中更美好的人性，所以还是希望合作能够占上风。

周柳建成：

我们再说说习近平主席和拜登总统半年多来的首次通话。白宫说电话是华盛顿打过来的。为什是现在？

周波：

我认为这种沟通，这种最高层的对话，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双方关系不太稳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这种常态化的对话非常、非常重要。谈到中美关系本身，遗憾的是，特朗普总统为中美关系定下的基调就是竞争关系。这不是中国想要的，中国仍希望双方是一种合作关系。目前，我们确实看到了由合作滑向竞争的这种不健康趋势，我最大的希望是它不会进一步滑向对抗。

周柳建成：

两位元首提出并讨论了近年重塑两国关系的若干问题。这是不是意味着，或者有证据表明，从现在开始情况会好转？

周波：

中美在经济和军事领域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小。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为美国会发现，在许多国际领域它必须与中国合作。这是我感到乐观的一个较重要理由。从经济上讲，中国经济相当于美国的70%。但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到2030年，以GDP计算，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经济体。没错，从总体上说，美国军队仍然比中国军队强大，但中国人民解放军用不着同美国在中国周边以外的地区竞争。如果你看中国的海外军事活动，无论是维和、反海盗、救灾还是从战乱国家撤离人员，都是人道主义性质的。在亚丁湾，中美在打击海盗方面有良好的合作，双方也可以携手应对其他的非传统威胁。所以，我们的大门永远是敞开的。我从来不认为美国是例外或不可或缺的。为什么国会山会有如此大的动乱？那是相当令人震惊的。中国的崛起为人们提供了常识，常识意味着在任何历史时期，不同的文明、社会制度、宗教、文化都要共存。

周柳建成：

周先生，非常感谢您今天抽出时间，让我有机会与您交谈。

“

我个人认为，合作而不是竞争，才是我们灵魂中更美好的人性。

《联合国宪章》的精神



何亚非
前外交部副部长

《联合国宪章》所代表的真正的多边主义，是行之有效的世界秩序之基石，而有效的世界秩序会带来和平与繁荣。只要面临严峻挑战的各国本着协作精神共同努力，前途就未必暗淡。

今年的10月25日，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日。当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2758号决议，该决议得到刚刚摆脱殖民统治不久的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支持。50周年给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机会，让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角度审视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以改善20多年来长期处于严重压力的世界秩序。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其最新报告《我们的共同议程》中说，“我们正处在历史的转折点”。

他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遭遇的最大共同考验，人类面临着一个严峻而紧迫的选择：是崩溃，或者突破。”

古特雷斯提到三大挑战：新冠疫情、军事冲突和气候变化。他的话凸显了21世纪前20多年里发生的无可回避的事实，那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翻天覆地变化，概括起来就是：

1. 全球力量平衡继续朝有利于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倾斜。全球治理结构已经发生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变得越来越担心，它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已经开始挑战其主导地位。这种对中国意图的误解促使西方对华采取强硬的对抗态度，包括可能的经济和技术脱钩。

2. 今天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挑战既有大国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带来的传统安全威胁，更有新冠疫情、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所有这些关乎人类存亡的危机，都给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带来巨大压力。

3. 过去20多年的技术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颠覆了以往的生活方式和经济发展模式。能否驾驭这场规模庞大、发展迅猛的技术革命，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对人类是一个考验。

4.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的拉锯战进入新阶

“

全球治理结构已经发生改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变得越来越担心，它们错误地认为中国已经开始挑战其主导地位。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其中部分内容称联合国“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所有权利，并承认其政府代表是唯一中国的合法代表”。



▲ 1971年11月15日，由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率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中国恢复其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首次亮相联合国大会堂。代表团立即成为第26届联合国大会（UNGA）关注的焦点。



▲ 1971年11月15日会议厅，代表团团长乔冠华被拍摄到了开怀大笑的经典照片。

“

没有集体安全，就不会有经济繁荣。

段，民粹主义、身份政治和民族主义为反全球化火上加油，同时，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的国内政治变得极端化。

由此而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全球治理框架？《联合国宪章》为有效的世界秩序奠定了基础，这种秩序维护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危机与机遇并存，只要我们秉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精神，共同携手应对严峻挑战，前途未必是暗淡的。

现在该是就以下方面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1. 重申《联合国宪章》作为公认的国际法核心对维护全球治理体系的现实意义和重要性。

根据《联合国宪章》，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避免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和军事对抗。“不冲突、不对抗”的态度必须是最低限度的全球共识。没有集体安全，就不会有经济繁荣。

2. 重振国际社会团结一致的精神，特别是大国之间，共同应对所有国家都面临的不断涌现的传统和非传统全球挑战。

这种团结曾在 2008-09 年世界金融危机期间有明显的体现，而 G20 就是在这种精神支撑下成为得到联合国成员国支持的全球首要经济治理平台。

3. 再次拥抱真正的多边主义，以主权国家为主体，通过众多参与方在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协调努力，来寻求一切大小问题或危机的解决之道。

在处理地区和全球事务时应摒弃并反对单边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孤立主

义，寻求真正的多边主义。这既需要勇气，也需要智慧。重塑世界秩序端赖于此。

4. 坚守现行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框架，通过机制和规范建设进行艰难而必要的改革，这一进程需要各国共同参与。

世卫组织和世贸组织将成为首批试验。换言之，在谈论基于规则的全球体系时，必须要看是什么规则，再评估它们是否应该被审视或改变——当然，还要关心由谁来做这些事。国际事务不应只由一两个国家或一个国家集团来处理，必须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全球治理体系中，由各国通过协商与谈判来办。

5.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享”是真正多边主义的精髓。地球村是现实，没有人有任何理由否认。共享和开放是全球合作的关键，也是摆脱当前和未来危机的唯一途径——而不是闭关自守或筑起高墙，以及建立基于意识形态划线的集团。

总之，我想借用古特雷斯在报告所强调的：“为人民，为地球，为繁荣，为和平”，共同愿景是可以实现的。

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对未来感到悲观。只要我们现在做出正确的选择，相互合作而不是相互对抗，我们就能克服危机，共同建立一个更美好、更安全、一体化的繁荣世界。除非我们认清严峻的现实，并从现在开始采取正确的行动，否则国际和全球治理体系是有可能崩溃的。

“

在谈论基于规则的全球体系时，必须要看是什么规则，再评估它们是否应该被审视或改变——当然，还要关心由谁来做这些事。

澳大利亚伤人害己

澳英美伙伴的核潜艇交易破坏了印太地区的稳定，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尤其是对法国来说，就像背后被捅了一刀。这些潜艇能如约交付吗？华盛顿根本不关心这个问题，它考虑的只不过是金钱与国内就业。



龚炯 (John Gong)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



9月16日，来自三个大陆且实力最强的英语国家——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领导人联合宣布建立 AUKUS 这一新的地缘政治和安全伙伴关系，来应对印太地区的所谓安全挑战。其目的是加强在网络问题、先进技术和防务领域的协调。

在这一新的伙伴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一项核潜艇交易：美国和英国将帮助澳大利亚建造和维护核动力潜艇。由此，澳大利亚将成为继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和印度之后，世界上第七个拥有这种强大水下武器的国家。这将极大增强堪培拉的军事实力，大

“

这意味着，非核武器国家，例如此次交易中的澳大利亚，在打算援引INFCIRC/153时，确实存在着应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来应对的核扩散风险。

幅提升其在地区安全事务中的地位。

不出所料，三国的核潜艇合作立即引发中国的愤怒反应。外交部发言人称，此举“严重破坏地区和平稳定，加剧军备竞赛，损害国际核不扩散努力”，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径”。

从北京的角度看，这些说法当然是不言而喻的。即使对美国来说，这也是继拜登政府阿富汗撤军失败之后，又一项糟糕透顶的外交政策。AUKUS听起来像“aw-kiss”，即“与地狱的可怕之吻”。在任何一方面，它都极其符合“伤人害己”的定义。

首先，AUKUS破坏了美国的全球安全框架。只有三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结盟，尤其还向澳大利亚提供核动力潜艇，从本质上讲，AUKUS就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现有安全安排之上建立起的一个迷你超级联盟。美国印太安全安排的主要基础是QUAD这一准联盟框架（包括美日澳印），所以，这实际上是在该联盟内部建立新的等级制度。

长期以来，美国政客一直鼓吹美英之间的特殊关系。众所周知，这种特殊关系源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历史和文化渊源。随着美国的战略利益转向印太地区，另一种盎格鲁-撒克逊关系（原本是充斥着英国罪犯的流放地）现在占据了重要地位。AUKUS清晰明确地体现了盎格鲁-撒克逊这一共性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澳大利亚是特殊的，印度和日本则不是。

但是，至少印度已经拥有一艘正在服役的核潜艇，也只是一艘。相比之下，日本一直都是二等公民，和美国打交道的时候处在政策考量的最底层。

AUKUS还破坏了美国的跨大西洋关系，是近年来对北约主要成员国最赤裸裸的背信弃义。此次核动力潜艇交易的前提，是澳大利亚放弃原本与法国签订的价值660亿美元合同。根据该合同，澳方将从法国海军集团购买12艘攻击级常规潜艇。法国曾把这一合同称作“世纪交易”，但现在巴黎却被残忍地抛到一边。

北约内部也明显存在着等级制度：英国是特殊的，法国和其他大陆成员国则不是。法国外长让-伊夫·勒德里昂表示，这一交易是“背后捅刀子”。他还表示，这是“野蛮的、单边的和难以预料的决定，让他想起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作为报复，法国召回了驻美大使。

AUKUS还破坏了位于美国国家利益核心的核不扩散事业。1970年的《核不扩散条约》确实存在一个漏洞，即只要国际原子能机构采取保障措施，非核武器国家可以发展非爆炸性核军事应用能力。这个漏洞写入了INFCIRC/153（IAEA 1972），这是国际原子能机构于1972年与无核武器国家签订的基本保障协议。

这意味着，非核武器国家，例如此次交易中的澳大利亚，在打算援引INFCIRC/153时，确实存在着应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来应对的核扩散风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表示，AUKUS

“

AUKUS清晰明确地体现了盎格鲁-撒克逊这一共性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澳大利亚是特殊的，印度和日本则不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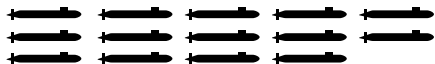
核潜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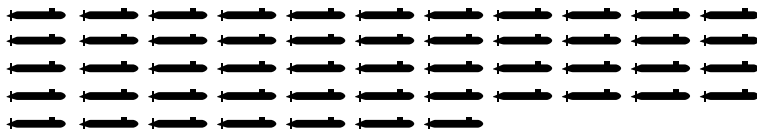
美国/美国海军 (USN)

共计
68

核动力弹道潜艇 (SSBN) 14



配备制导弹专用发射管的核动力潜艇 (SSGNs) 51



核动力攻击潜艇 (SSNs) 3



俄罗斯/俄罗斯海军 (VMF)

共计
29

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SSBN) 11



配备制导弹专用发射管的核动力潜艇 (SSGNs) 7



核动力攻击潜艇 (SSNs) 11



中国/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PLAN)

共计
12

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SSBN) 6



核动力攻击潜艇 (SSNs) 6



英国/皇家海军 (RN)

共计
11

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SSBN) 4



核动力攻击潜艇 (SSNs) 7



法国/法国海军 (FS)

共计
8

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SSBN) 4



核动力攻击潜艇 (SSNs) 4



印度/印度海军 (INS)

共计
1

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 (SSBN) 1



资料来源：国际空间站、南华早报

的核潜艇协议损害了国际核不扩散努力，显然就是指的这些风险。具体来讲，风险源于两个方面。

首先，这样的国家可能需要发展自己的铀浓缩能力，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如何确保其浓缩材料不会应用于核武器开发？例如，巴西曾试图在法国的帮助下建造核动力潜艇，它的确也在国内建造了一座铀浓缩工厂。

另一潜在的核扩散风险源于潜艇反应堆的燃料循环。赵立坚说，国际社会有理由担心澳方恪守核不扩散承诺的诚意。也正因如此，对于这两类风险，存在一整套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参与的繁琐保障程序。

澳大利亚真的致力于核不扩散吗？换个角度问，一个已经开发铀浓缩技术的国家，或者已经在花费几百亿、几千亿美元之后获得充足浓缩铀供应的国家，是否会止步于用这种厉害的材料为几艘潜艇提供动力，抵制住诱惑，不开发可以为自己提供强悍全球和地区实力与地位的东西？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目前为止，历史上还没有给出肯定答案的先例。

AUKUS 还破坏地区力量的平衡，因为它刺激其他国家发展本国的核动力潜艇，进而有可能刺激地区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韩国曾公开表示对获得核能力有兴趣。2017年11月，



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目前为止，历史上还没有给出肯定答案的先例。

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访问首尔期间，韩国总统文在寅就曾询问从美国购买核动力潜艇的可能性。

加拿大是盎格鲁集团的另一主要国家，早在1987年就公开探讨从法国和英国购买攻击型核潜艇的可能性。但该想法随后被华盛顿直接否决。印度尼西亚呢？该国可能觉得也需要购买这样一个新武器，因为澳大利亚将来会拥有。日本呢？鉴于美国过去对待加拿大的情况，如果日本确实对核动力潜艇有野心，美国似乎是唯一可能的供货来源。

那么，美国会出售吗？这将是极具讽刺性的事情：世界上唯一的核受害国，不得不从曾在其上空制造蘑菇云的国家手里购买核武器。

最后，不管信与不信，AUKUS都将伤害澳大利亚自己的国家利益。考虑到美国国防承包商对美国政府的贪婪榨取，现在甚至不清楚核动力潜艇是否或者何时能在澳大利亚海军服役。

看起来，完成此次交易是充满变量的繁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美英国防承包商将“帮助”

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而不允许该国发展铀浓缩能力。同时，将实施一系列涉及多方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步骤和程序，以遵守核不扩散的要求。

此事之所以复杂，还源于一个事实，那就是澳大利亚过去从未建造过像样的常规潜艇。澳大利亚总理斯科特·莫里森说，这些核潜艇可能要到2040年才能服役。作为外行人，我感觉这种估计是很乐观的。至少20年里，贪婪的美英国防承包商将大肆榨取约1000亿美元的澳大利亚纳税人资金。到最后，我不确定澳大利亚是否真的会像美英承诺的那样，拥有强大的核潜艇。即使获得了这些潜艇，将来在浓缩铀供应和舰艇维护方面，澳大利亚也将受制于美国。那就祝澳大利亚在这方面好运吧。

总之，在中国看来，AUKUS对地区和平与稳定产生负面影响，从华盛顿的角度看，这似乎也是一桩割韭菜交易。那么，为什么澳大利亚还愿意参与呢？我认为，在拜登所有美丽但明显空洞的言辞背后，其真正的目的是钱。AUKUS撕毁了与一位欧洲主要盟友的660亿美元现有合同，取而代之的，是用核反应堆取代柴油发动机，为美国国防承包商谋取到一笔大约1000亿美元的买卖。这是一笔巨额资金，意味着康涅狄格州和美国其他地区的大量就业机会。

这笔交易是否符合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这些强大的潜艇是否能如约交付？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而美国现任政府根本不在乎。



即使获得了这些潜艇，将来在浓缩铀供应和舰艇维护方面，澳大利亚也将受制于美国。



华盛顿如何疏远了中国的年轻人



李成 (Cheng Li)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高级研究员

中国年轻一代人几乎生来就见证国家的繁荣与日益强大，并培养出一种有别于老一辈的自豪感和身份认同感。现在，美国开始公开挑战中国的崛起，这败坏了人们对美国的看法。

最近，中国的社交媒体上有帖子讲了这样一个笑话：

一位中国学生对美国同学说：“我想在美国学宣传。”

“美国没有宣传这种东西，”美国学生答道。

中国学生说：“对了，你这正是我想学的。”

这个笑话反映了中国年轻人对美国内政外交越来越多的怀疑、批评和失望。过去两年来，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彼此的猜忌、担忧和敌意不断增加，太平洋两岸都兴起甩锅、宣传战和阴谋论。

“

过去两年来，中美关系急剧恶化，彼此的猜忌、担忧和敌意不断增加，太平洋两岸都兴起甩锅、宣传战和阴谋论。

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在中国年轻人当中尤其明显，其中也包括那些曾经或正在美国学习的人。正如康奈尔大学政治学家白洁曦（Jessica Chen Weiss）最近观察到的，如今中国的年轻人“在外交政策信仰上比老一辈更为强硬”。

中国 90 后：对美态度的转变

城市当中的 90 后群体，尤其是 20 岁上下的人，是生长在富裕的社会中。可以说，与父辈和祖辈相比，在生活方式、接受高等教育（包括出国留学机会）和数字化时代社交方面，中国城市年轻人与发达国家的同龄人更相似。

李春玲是中国著名的青少年研究学者，《中国青年：在持续的不平等中增加多样性》是她的最新著作。据她观察，中国的年轻人已经不同于在“崇洋媚外时期”长大的 60 后



和 70 后。在邓小平改革开放时期成长的中国年轻人眼里，美国是“自由民主的灯塔”和“山巅之城”（灯塔国），1989 年的天安门运动正体现了这种情绪。

2018 年，李春玲就“国家认同”这一问题展开研究，对 1 万多名国内受访者的国家认同感进行了评测。调查数据显示，年纪越小的人国家认同感越弱，受过教育的 90 后受访者的国家认同感最低，而且较低的国家认同感与在名牌大学就读存在着明显的相关性。2017 年，另一个中国研究团队对全国 157 所高校的 1 万名 95 后大学生进行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大多数学生缺少入党的动机和热情。

至于中国年轻人对美国的态度，2018 年之前对中国公众的多次民调显示，中国民众对美国的看法普遍非常正面，虽然爱恨交织或矛盾心态并不少见。我对过去 10 年回沪“海归”们所做的调查也显示，大多数人对美国都有好感，2009 年的比例为 90%，2014 年为 92%。我的研究还显示，与在其他国家和地区留学的人相比，从美国留学回来的人对美国的好感度最高。

华盛顿鹰派立场对中国及其民众的影响

中国年轻人的世界观，包括他们对美国的态度，近年来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然这其中有许多因素在起作用。对于北京对国内进行过度的政治控制，以及它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华盛顿的担忧是可以理解的。从美国的角度看，美国的安全和知识产权理应受到大力保护。然而，华盛顿一些决策者的强硬政策和言论给中国公众，特别是给在美国的中国学生和学者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中国年轻人近年的这一波反美情绪，也

许是对华盛顿鹰派决策者下列敌对行为的反应：

- 声称北京正将大量在美国高校就读的中国学生“武器化”，而且，由于这些学生在中国的家人受到中共当局的恐吓，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得不去充当间谍，或窃取先进技术；

- 针对中国科学家和美国华裔科学家，美国司法部（首次）启动针对特定国家和种族群体的计划——“中国行动计划”，并使用了“学术间谍”这种有争议的新术语；

- 使用“中国病毒”和“Kung Flu”等词语，引发恐华和反亚裔的仇恨犯罪；

- 限制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约3亿人）赴美；

- 侮辱中国的文化遗产。例如在2020年12月的一条推特中，共和党参议员玛莎·布莱克伯恩称“中国有5000年的欺诈和盗窃史，有些事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

在近年这些不幸事件发生之前，中国年轻人当中的爱国主义（及仇外情绪）已经高涨。2018年中国的一项调查发现，90%的90后对西方国家对中国抱有的“偏见”不满。当年，对1万名2000年后出生的中国年轻人的另一项调查发现，80%的人觉得“中国不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就是正变得一天比一天更好”。

北京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多年来，中国当局都非常关注年轻人的



仅在2018年，中共就吸收了164万名35岁以下的党员，占新党员总人数的80%。

世界观和对党的认识。他们意识到，在世界各地，年轻人往往是激进社会运动的核心参与者，如2011年伦敦的夏季骚乱，以及10年前席卷中东和北非的“茉莉花革命”。从中国当局的角度来看，本国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是敌对势力渗透的主要目标。

在2012年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之后不久，习近平就呼吁加强对中国青年的意识形态教育，表示“青年的价值取向决定了未来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由于深信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势力意在颠覆共产党的统治，习近平在2016年要求国家教育部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9年1月，在中央党校举行的一个重要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会议上，习近平列出了中国面临的七大风险，其中前两个主要与青年有关。由年轻人主导的香港示威活动也被习所鉴戒。

另有报道称，习近平还就95后大学生的入党情况调查发表意见，呼吁加大力度吸收95后学生入党。第二年，35岁以下的党员人数就达到2200万，占党员总数的24.4%。仅在2018年，中共就吸收了164万名35岁以下的党员，占新党员总人数的80%。

2020年春季对1.7万名大学生做的一项全国性调查发现，近年中美关系的紧张（包括贸易战和孟晚舟事件）大大提高了中国大学生对地缘政治的兴趣，助长了日渐升高的民族主义情绪。仍然有大量的中国学生选择在美国学习，2021年夏天约有8.5万中国公民获得了赴美留学的学生签证。不过，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美国的中国学生比例就已经开始下降了。

越来越多中国的优秀学生选择了中国自己的顶尖大学。根据清华大学2021年9月发

“

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需要问一问，美国继续麻木不仁和疏远中国广大的年轻人，究竟是有助于推进还是会损害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

布的一份报告，过去10年中，该校只有约14%的毕业生出国深造。报告还发现，截至今年4月，在2002年至2011年出国的清华校友中，有超过一半的人已经回国工作，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增加。《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指出，如果美国不再欢迎中国优秀的学生和研究人员，“北京将张开双臂欢迎他们回去”。

华盛顿失去影响中国未来的影响力

美国对华政策当中一个延续百年的观点是：重要的，是要影响(或教育)中国的年轻人，

因为他们最终将影响国家的发展。这种观点认为，在维持世界和平方面，基于教育的战略比枪炮和战舰更加有效。卡特总统和邓小平发起的令人瞩目的美中教育交流活动，就体现了两国的共同理想。

但在今日的华盛顿，后尼克松时代的对华“接触”政策被贴上标签，其中最好的评价是天真，最坏的评价就是失败。在美国的一些政治领导人看来，总体上讲，双边教育交流不再是学术交往带来积极变化的希望所在。相反，人们担心中国的年轻人，包括美国大学里的

中国学生，担心他们大多是被洗脑的民族主义者，是被中共利用来破坏美国实力和利益的武器。

然而，正如最近一位对中国年轻人有多年研究的美国人所指出的：“拒绝承认他们(中国年轻人)是有自己想法、梦想、恐惧和欲望的个体，是非常令人痛心的疏忽。”同样的，《经济学人》驻中国记者斯蒂芬妮·斯杜德最近也注意到，“中国年轻人既爱国，从社会角度看也是进步的”。在支持LGBT和女性权利，以及支持消费者权益、分配公正性、环保及其他社会自由政策方面，他们更加敢说敢言。

对在美国留过学的中国学生来说，美国教育和研究机构的慷慨开放是怎么说都不为过的，更不要说美国社会对他们观点和价值观的巨大影响了。同时，不难理解，美国某些角落里的种族歧视也极大助长了中国学生对中国政府和支持。

华盛顿的政策制定者们需要问一问，美国继续麻木不仁和疏远中国广大的年轻人，究竟是有助于推进还是会损害美国的价值观和利益。从战略上讲，如果疏远了中国的年轻人，美国还能指望对中国未来的演变有什么影响力呢？





持久共存所需的规则



何伟文
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在管理双边贸易和竞争时，唯一正确和可行的方法是应用 WTO 规则。中国和美国应制定彼此关切的事项清单，并找到符合 WTO 关于补贴、政策和国家安全规则的解决方案。这是维持持久共存的唯一途径。

在概述美国政府对华贸易方针的重要讲话中，美国贸易代表戴琪用“持久共存”作为关键词，强调中美双边关系的重要性。这与唐纳德·特朗普的新冷战主张形成鲜明对比。

她说：“我们之间的关系并不只是影响我们两个国家；它影响到整个世界和数十亿的劳动者。”因此，两国应该共存并长期发展。这当然是个积极的想法。

为了实现这一想法，戴琪呼吁进行公平和有管理的竞争。与她的前任罗伯特·莱特希泽相比，这一观点肯定释放出更积极的信号，将为尽早启动中美贸易对话创造新机会。

然而，戴琪的讲话，是首先将中国置于违规者的位置，为她随后提出的各种做法寻找理由。她说，中国是“以国家为中心的经济体制”，“缺乏对全球贸易准则的遵守”，而这“削弱了”美国人和世界各地人民的繁荣。

事实胜于雄辩

戴琪称，上世纪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中期的10年间，美国对华出口增长14倍。然后她断言，中国加入WTO后一直表现得“缺乏对全球贸易准则的遵守”。



然而，戴琪的讲话，是首先将中国置于违规者的位置，为她随后提出的各种做法寻找理由。



如果中国不遵守全球规范，为何美国对华出口增速远远超过对其他据说遵守全球规范的国家出口增速？

但她提供的贸易增长数据并不准确。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1979年，也就是中美建交当年，美国对华出口额是18.6亿美元。2001年，中国加入WTO时，增至262.1亿美元，增长14倍。因此，14倍的增长发生在中国入世前的22年里，而不是截止到80年代中期。

中国入世后，美国对华出口增速远远超过其全球出口和对华进口。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入世后的18年间，美国的全球出口从2002年的6931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1.42万亿美元，增长105.6%。然而在此期间，美对华出口从221.3亿美元激增到1244.9亿美元，增长462.5%，是其全球出口增速的四倍多。

如果中国不遵守全球规范，为何美国对华出口增速远远超过对其他据说遵守全球规范的国家出口增速？其实，在同一时期，美国的全球进口额增长101.1%，而中国的全球进口增长247.3%。美国全球出口和进口的增速相当，而其对华出口增速是对华进口的两倍。我们如何解释美国的对华出口远远超过对华进口，而中国却“削弱了美国人和世界各地其他人民的繁荣”呢？



2017年，随着美国大幅加征关税，中国的对美太阳能电池板出口下降90%。此后，在美国市场上几乎没有影响力。

美国钢铁业面临的问题源于自身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并非中国的原因。2002年，本人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工作。当时小布什总统宣布由于钢铁进口量不断增加，决定征收钢铁进口附加费。但这和中国没有太多关系，中国当时占美国钢铁进口的比重不到3%，基本可忽略不计。

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今天。2018年，特朗普在全球范围内加征钢铝产品关税，主要目标是加拿大、巴西、土耳其、俄罗斯、德国、日本和韩国。中国约占美国钢铁进口的2.5%。2021年上半年，中国在美国钢铁进口中的比重几乎没有变化，为2.4%。

中国也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倾销钢铁。21世纪初，中国的钢铁出口迅猛增长，的确引发了其他国家的抱怨。但此后，随着中国采取强有力的控制措施，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

化。2020年，中国钢材出口5140万吨，进口3790万吨，净出口1350万吨。相比之下，日本和韩国的钢材净出口量分别是2980万吨和1610万吨。

2017年，随着美国大幅加征关税，中国的对美太阳能电池板出口下降90%。此后，在美国市场上几乎没有影响力。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记录显示，美国才是头号违规国家。截至2021年10月7日，在提交给争端解决机制的606起案件中，美国是159起案件的被告，超过总数的1/4，超过欧盟（89起）和中国（47起）的总和。中国的合规情况是由WTO总理事会，而不是由美国等个别成员来裁定。而且，中国的贸易政策已经通过了总理事会的所有七次中期评审。在其发起的针对中国的诉讼中，美国也并没有全部获胜。2019年7月16日，争端解决机制裁定，美国针对中国太阳能电池和风力发电塔的11起反补贴措施违反WTO规则。同年11月11日，WTO授权中国对美国征收36亿美元的报复性关税，这也是WTO近年来开出的最高罚单。



我们如何解释美国的对华出口远远超过对华进口，而中国却“削弱了美国人和世界各地其他人民的繁荣”呢？

必需遵守WTO规则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讲话的核心内容，是中国“以政府为中心”的经济体制，特别是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国的芯片发展战略和财政支持也是被关注的重点。让人感到讽刺的

“

美国汽车制造商特斯拉获得21亿元人民币（3.25亿美元），标准与其他制造商（包括比亚迪、北京汽车、东风汽车等）相同。

是，美国和欧盟都做着同样的事情。就在几个月前，美国参议院正忙着推进《美国芯片法案》，以提高该国在微芯片制造、测试和封装方面的自给率。根据该法案，美国计划向人工智能、芯片和量子计算领域拨付1100亿美元资金，从而成为《无尽前沿法案》（Endless Frontier Act）投入最大的后续行动。今年9月15日，欧盟委员会向欧洲议会宣布，《欧洲芯片法案》正在酝酿之中，计划投入1340亿欧元来增强欧盟的自给自足能力。所以，为什么单单指责中国呢？

WTO规则认为，世界上多数主要经济体普遍实行的产业政策并不违规，但它要求各国对境内的所有商业实体实行非歧视性或者国民待遇。中国国务院促进集成电路产业的最新指导意见明确表示，中国境内的所有企业，无论是私营企业、外国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有资格获得同样的措施支持。因此，自给率也包含在华外资企业的份额。

新能源汽车领域可以很好地体现国民待遇原则。最近，中国工信部宣布，在2016-2020年期间向新能源汽车制造商提供了补贴，美国汽车制造商特斯拉获得21亿元人民币（3.25亿美元），标准与其他制造商（包括比亚迪、北京汽车、东风汽车等）相同。

国有企业是许多国家都有的一种所有权类型，并非中国特色。国有企业占中国经济总量的33%，与法国水平相当，但比瑞典低得多，瑞典国有企业占企业总数的60%。因此，

关键问题不是所有权，而是国民待遇。

国有企业占中国出口的比重非常小。今年1至8月，中国全球出口总额为2.1万亿美元，国有企业贡献1721.6亿美元，占比8.2%；外商投资企业贡献7213.2亿美元，占比34.4%；私营企业贡献1.16万亿美元，占比55.5%；其他所有制企业占比1.8%。如果中国一直大量补贴出口，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而非国有企业。

基于以上阐述，管理双边贸易和竞争时，唯一正确和可行的途径是依据规则和准则寻求共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必须只适用WTO规则。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如果其政策违反WTO规则，都不能应用。中美两国应制定彼此关注的事项清单，然后严格按照WTO关于补贴、政府政策和国家安全的相关规则，来确定并讨论问题及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相互认可且牢固的规则基础，维持世界上两个最大经济体的持久共存。

“

如果中国一直大量补贴出口，最大的受益者应该是私营企业和外国企业，而非国有企业。



▲ 2021年8月15日，在中国浙江省宁波-舟山港的一个集装箱码头可以看到成排的卡车。中国进出口总额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同比增长22.7%至28.33万亿元。

全球复苏，无证据显示与中国经济脱钩



休·斯蒂芬斯 (Hugh Stephens)

加拿大亚太基金会高级研究员

企业总是会选择具有竞争力并且可靠的合作伙伴，而中国的经济实力非常强大。因此对大多数国家来说，除了少数专业领域，所谓“脱钩”更多的只是嘴炮，而非现实。同时，从动物蛋白到汽车、时尚配饰等，中国中产阶层的需求也在增加。所以大规模的经济脱钩似乎不太可能发生。

随着世界经济在新冠疫情肆虐之后开始重建，中国继续在全球复苏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尽管，由于西方经济体开始复苏，中国的相对优势可能会减弱。与其他经济体一样，中国在疫情暴发初期也经历了生产和航运中断带来的负增长冲击，但它很快就恢复过来。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是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增幅为2.3%。这种增长一直持续到今年上半年，今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同比增长18.3%，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增幅。当然，2020年第一季度的时候正是新冠疫情首次暴发，全国各地都停工停业。但今年的实际季度环比增长率却低多了，第一季度仅比2020年第四季度增长0.6%。不过年中的时候，世界银行仍表示看好中国，预计它的2021年GDP增长率为8.5%，甚至超过中国自己预计的6%。

这样的经济实力，使得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说法与现实脱节。不仅中国的增长一直引领着全球经济复苏，北美和欧洲经济的反弹也推动了对中国商品的持续需求。中国继续在全球供应链中发挥着主导作用。虽然很多人都在谈论要将供应源从中国转向多元化，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诚然，新冠疫情引发的供应链中断使得各国更加大力地推动供应源多样化，并呼吁一些产品制造回流，但企业仍会发现，中国的许多产品难以被取代。到头来，业务仍将流向供货有竞争力且可靠的地方。

“

这样的经济实力，使得与中国经济脱钩的说法与现实脱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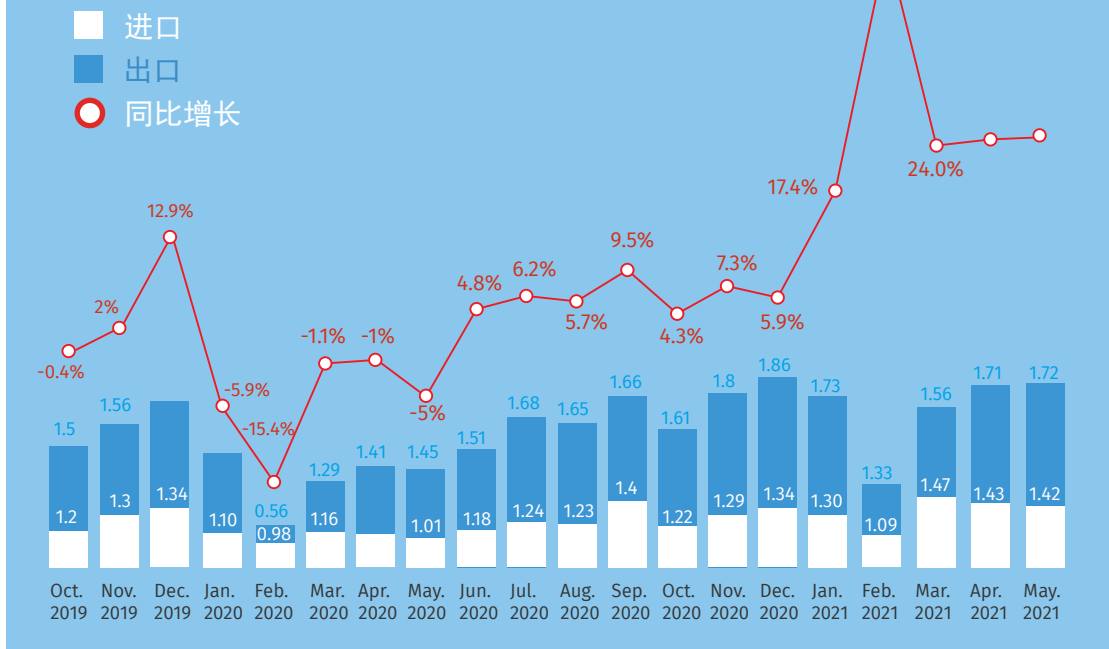
“

到头来，业务仍将流向供货有竞争力且可靠的地方。

加拿大政府最近的一项研究注意到，中国是许多全球贸易商品的主要供应国，每12件HS-6分类贸易商品中就有一件产自中国（HS-6是国际上使用的商品分类体系），而加拿大近50%的生产投入都含有一些中国成分，失去任何这些进口产品，都可能给加拿大经济和企业造成巨大损害。例如，加拿大97%的产业从中国进口电气设备和配件，以及计算机、计算机外围设备和零部件。这项研究还显示，随着时间推移，从中国的进口发生了变化。20年前，由于拥有低成本半熟练劳动力和相对良好的基础设施，中国是供应链上的组装中心。当时，加拿大从中国进口的大部分是消费品。到2019年，消费品占比已大幅下降。中国不再只是最后的组装中心，而是在生产过程中贡献了更多的高附加值投入。如果加拿大是这种情况，那么中国的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肯定也有类似的情况。

尽管中国在许多关键领域占据主导地位，但疫情给进口商上了重要一课。对关键商品或零部件单一供应源的依赖，有可能导致供应链中断，并暴露自己的软肋。2020年初，当中国工厂因新冠疫情关闭，或不肯交货时，这一点就体现出来了。全球对N95口罩、药品、医用防护服等的抢购，让人们突然意识到供应链的脆弱性。有迹象表明，由此而来的对供应多元化的推动，在美国已经取得

2019–2021年中国对外贸易



▲ 2021年前五个月，中国对外贸易同比增长28.2%至14.76万亿元（相当于2.3万亿美元），月度贸易额较上年保持增长势头。

一些成功。《福布斯》报道说，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国内进口商品在2020年6月到2021年3月的九个月里增加了33.7%，但从中国的货物进口同期仅增长6.9%。部分原因可能是特朗普的关税，但也有部分原因是商业行为。

当出现供应堵塞或短缺时，进口商会竭尽全力寻找替代供应源。它们当中的一部分是可以接受的合作伙伴，其他则存在交货和质量问题。一些新的供应商可能会取代原来

的供应商，但从长远看，随着供应链恢复正常，可获得性和价格往往优先于战略考量。对中国很可能就是这种情况，虽然发达国家的许多制造商和零售商会试图通过开辟第二供应源来对冲风险。

在自由市场经济体中，政府只有有限的手段来推动贸易多元化。这些国家的政府也许会鼓吹多元化，甚至通过设置贸易壁垒（就像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口商品征税）来

“

《福布斯》报道说，随着美国经济复苏，国内进口商品在2020年6月到2021年3月的九个月里增加了33.7%，但从中国的货物进口同期仅增长6.9%。部分原因可能是特朗普的关税，但也有部分原因是商业行为。

“

但要让中国经济与西方分离并不容易，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互有需要，而且，双方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

转移贸易，但自由市场经济体很难强制多元化。而且，许多产品是可替代的，因此供应源转移的结果往往是贸易流动填补了真空，替代多于转移。即使在中国这样一个以指令性经济为主的国家，强迫进口商改变供应源也并不总是那么容易，除非人为设置壁垒，如植物检疫检查、拒绝进口许可或征收关税。

例如，中国政府曾试图在经济上惩罚澳大利亚，以报复它眼中的堪培拉反华政治行为。但它却发现，很难找到合适的澳大利亚铁矿石替代品。事实上，澳大利亚对华出口总额在2021年上半年破了记录。另一个说明强行经济脱钩难度的例子，涉及中国2019年禁止进口加拿大猪肉的行动。中方的理由是为了保护健康和安全，但加拿大人普遍认为，进口禁令是中国对华为高管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表示不满的一种方式。然而仅仅几个月后，货运就恢复了。中国因为猪瘟暴发，突然面临猪肉短缺，此事肯定是导致事情急剧变化的一个因素。所有这些都表明，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与中国脱钩更多的可能只是嘴炮，而非现实。只有少数专业技术领域或专门的产品及大宗商品（如稀土）除外。同样道理，从动物蛋白、汽车到时尚配饰，中国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也将需要更多的投入，尽管中国可以满足部分自身需求，但远远谈不上自给自足。

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疫情的持续限制和某些供应及航运瓶颈，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回到更正常的速度。与此同时，

其他经济体开始填补空缺，这让中国重新成为重要的、但却不是唯一的经济增长引擎。举例来说，2020年，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大幅增长，与包括主要市场美国在内的其他贸易伙伴的贸易却出现停滞或下滑。而到2021年6月，加拿大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加拿大与中国的贸易同比稳定增长近12%，与美国的贸易却大幅反弹了34%。

这一切对未来意味着什么？中国将继续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它也无法在供应冲击面前免疫。在需求方面，人们对完全依赖于中国的供应链进行了一些反思，这更多是出于经济原因，而非政治原因。但要让中国经济与西方分离并不容易，中国经济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互有需要，而且，双方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尽管很多人都在谈论经济脱钩，但现实中证据却很少。未来的挑战，将是如何管理出现的政治和技术挑战，维护好中国经济崛起给中国和北美、欧洲、日本和大洋洲等发达经济体带来的共同利益。

“

所有这些都表明，对大多数国家来说，与中国脱钩更多的可能只是嘴炮，而非现实。

中美交流基金会简介

中美交流基金会于 2008 年在香港设立，基金会坚信，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发达国家，和中国这个人口最多、迅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两者的积极关系对于世界的福祉至关重要。基金会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性的实体。

中美聚焦网简介

China-US Focus（中美聚焦，www.chinausfocus.com）由中美交流基金会主办，于 2011 年在香港成立，是目前全球唯一的专注中美关系的网络媒体。中美聚焦网站为中美问题的专家、学者、智库和意见领袖搭建了一个交流观点、理性探讨中美关系的平台，成为两国民众和世界了解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窗口。

CHINA ↔ US Focus IS PROUD TO INTRODUCE...



A new storytelling experience bringing you up close to the fascinating people shaping our shared global future.

Weekly videos and podcasts hosted by James Chau take you on an exciting journey to 'see' and 'hear' China first-hand.

Now available on all major digital and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hechinacurrent](https://www.instagram.com/thechinacurrent)



ABOUT JAMES CHAU

James has earned a special reputation for his interviews with world leaders in politics, science and health. Amongst them, Nobel Peace Prize winners Jimmy Carter, Kofi Annan, Muhammad Yunus and Aung Sang Suu Kyi, and also Winnie Mandela, Arianna Huffington and Christine Lagarde. He serves as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oodwill Ambassador and UNAIDS Goodwill Ambassador.

